

202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调研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中心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与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业界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实证研究。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 50% 组建而成，公司于 2003 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26.3 亿元，资产规模超过 340 亿元，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

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目录CONTENTS

01. 摘要

1.1 退休生活愿景：传统观念与保守预期塑造退休准备新特征	2
1.2 退休准备指数：2023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	3
1.3 退休财务规划：个人责任意识与产品服务需求增强	3
1.4 专题研究	4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6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6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失衡，第二、三支柱亟待发展	9
2.2 项目概况	11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11
2.2.2 样本分析	12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

3.1 退休生活愿景	20
3.1.1 退休年龄预期：年轻人期待早退休，高学历人群偏向晚退休	20
3.1.2 养老方式偏好：家庭养老仍为主流	21
3.1.3 退休生活品质：医疗服务和家人陪伴最受重视	22
3.2 退休生活信心	24
3.2.1 退休生活担忧：身心健康问题易引发困扰	24
3.2.2 退休生活信心：疫情影响尚未恢复，对下一代的看法存在分化	25

0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4.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28
4.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28
4.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化	29
4.1.3 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32
4.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34
4.2.1 个人特征：临近退休的男性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34
4.2.2 家庭特征：已婚且养育两个子女的个人指数更高	36
4.2.3 健康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37
4.2.4 教育特征：学历越高，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38
4.2.5 工作特征：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指数更高	39
4.2.6 收入特征：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退休准备指数正相关	39

05. 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5.1 退休收入来源	42
5.1.1 居民退休收入：“三支柱”体系	42
5.1.2 退休收入来源预期：仍主要来自政府，但不同人群有所分化	42
5.2 退休财务准备现状	45
5.2.1 储蓄积累方式：普遍倾向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45
5.2.2 家庭资产配置：房产价值占比最高，风险资产和保险配置比例和家庭财富正相关	46
5.2.3 商业保险覆盖率较低，寿险在商业保险中更受人们偏好	49
5.2.4 对财务建议的信任：人们更愿意相信政府和亲属的建议，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越高的人群，商业保险覆盖率也越高	50
5.3 退休财务准备需求	53
5.3.1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最关注本金安全、流动性和账户透明	53
5.3.2 金融产品附加服务：财务规划咨询服务最受欢迎	55
5.3.3 企业退休服务：人们最希望企业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56

06. 专题研究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风险感知与退休准备	58
6.1.1 客观金融素养明显提升，主观上存在金融素养不自信现象	58
6.1.2 居民对老龄风险的客观认识不足，但主观感知水平较高	62
6.2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67
6.2.1 居民对三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弹性制度呼声最高	67
6.2.2 多重因素影响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	69
6.3 中国居民对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	70
6.3.1 居民缺乏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对政策普遍持观望态度	70
6.3.2 现行缴费上限具有一定吸引力，仍存在预期提升空间	72
6.3.3 选择年金式领取方式人群有限，普及个人养老金政策或是有效手段	73
6.4 青年群体的退休准备分析	75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75
6.4.2 青年群体的退休计划和准备情况	77
6.4.3 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	80
6.4.4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84

07 结论与建议

7.1 报告内容总结	86
7.2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87
7.3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88
7.4 个人应付出的努力	89
7.5 保险机构可作为的领域	90

08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01·摘要

01. 摘要

1.1 退休生活愿景：传统观念与保守预期塑造退休准备新特征

2023 年中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愿景保持传统观念，对退休生活的信心较为保守。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年轻人普遍预期提前退休。

具体而言：

◆ 未退休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8.01 岁；年轻人普遍预期提前退休，不同学历人群对退休年龄的预期存在异质性差异。

◆ 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仍为受访者最偏好的养老方式；良好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家人陪伴是人们最重视的退休生活品质；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是人们对退休生活最大的担忧。

◆ 疫情对居民退休生活信心的影响尚未完全恢复；人们对下一代的退休前景预期较为保守。



扫码查看电子版报告



扫码查看报告重点内容摘要

1.2 退休准备指数：2023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

2023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在六个维度上相较 2022 年均有所下降，尤其是在“退休责任意识”、“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下降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

2022 年退休准备指数较高的省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均有明显下降，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在缩小；相比之下，中低收入人群的退休准备水平下降更为明显。

整体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具有男性、临近退休、已婚且养育两个子女、身心健康、学历水平较高、在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收入水平较高等特征。

1.3 退休财务规划：个人责任意识与产品服务需求增强

尽管政府依然在人们的退休准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国居民已逐渐脱离完全靠政府养老的观念，退休财务规划的个人责任意识与产品服务需求有所增强。

具体而言：

我国居民预期的退休收入仍主要来源于政府，但对来自个人的退休收入比例预期逐渐提高。

居民普遍倾向于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存在一定困难；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较为单一，房产占比超过六成，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偏低，只有较富裕的家庭才会配置风险资产和保险产品。

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政府和亲属的财务建议，对保险人越信任的居民购买保险的意愿越强，对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信任程度与商业保险覆盖率正相关。

对于养老金融产品，人们更关注本金安全、流动性和账户操作的公开透明，对收益的要求不高；产品之外，人们希望从金融机构获得全面、专业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还希望企业能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1.4 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分别从“居民的金融素养与风险感知”、“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分析”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居民的金融素养相比 2022 年有所提升，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对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老龄风险的客观认知存在不足，但对老龄风险的主观感知较强。

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较为保守，对弹性退休政策最为支持。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缺乏了解的居民普遍对政策持观望态度，而充分了解的居民则普遍支持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设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缴费上限税收优惠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绝大多数年轻人意识到应当增加更多地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但由于收入有限、需要将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当前生活，因此储蓄水平尚不充足；青年群体普遍认为生养、教育子女的经济成本导致了当前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下。



02·项目背景及概况

02. 项目背景及概况

2.1 项目背景

2.1.1 人口老龄化现状：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

我国目前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人口老龄化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居民的养老财务准备带来了巨大挑战。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不断攀升**，如图 2.1 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其中 0-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35%，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6.79%，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而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则上升了 4.63%。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老龄化程度的界定标准，一个国家 6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 7%，或者 60 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0%，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4.90%，达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我国各个省份、地区都已经存在。2020 年，在大陆 31 个省份中，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其中 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川渝、长三角以及中部地区。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将给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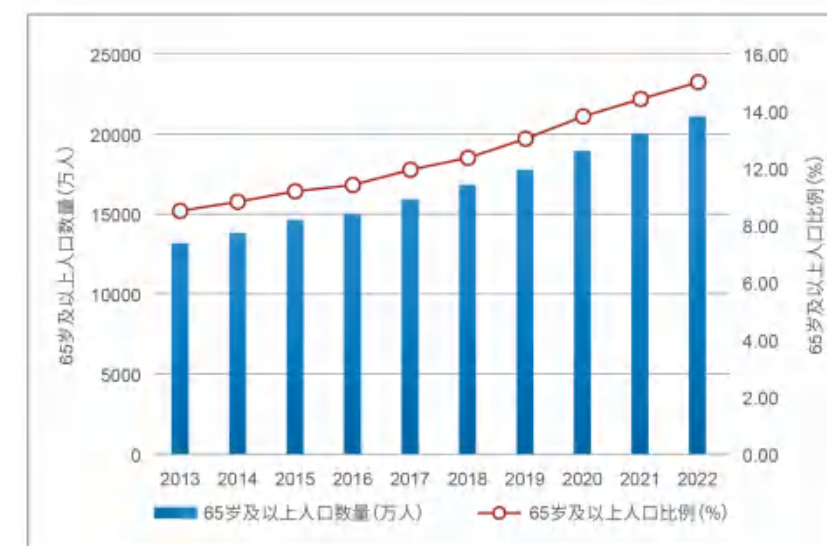


图2.1 2013-2022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与比例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近年来却持续下降，并在2022年出现了重大转折。如图2.2所示，2022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至6.77‰，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人口总量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岁）的比例，表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抚养比越高，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越大，年轻人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负担也越严重。2022年，我国社会的老年抚养比达到21.8%，较上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表明每名老年人需要约5名劳动人口来抚养。倘若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滑，可以预期未来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年轻人面临严峻的赡养负担。

许多学者对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潜在收支缺口和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结论普遍趋于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认为，我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在2035年前后累计结余耗尽。事实上，近年来由于遭受新冠肺炎的冲击，为了缓解企业经营与现金流压力，不少省份实行了减税降费等措施，导致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在2020年首次出现了收支缺口。在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未来政府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与财政负担，当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保养老基金运营模式恐难以为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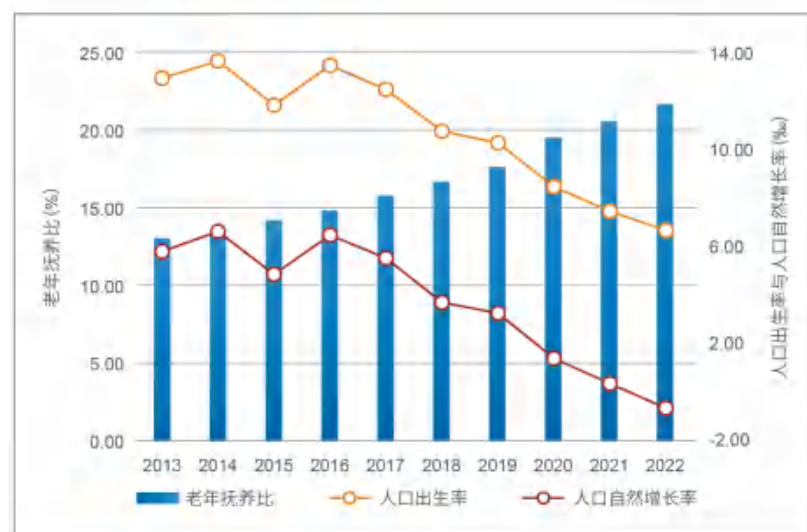


图2.2 2013-2022年中国老年抚养比、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生育率的下降，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年，中央政府决定松动已经执行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了“单独二胎”政策，出生人口在次年得到回升。2016年，为了进一步刺激生育，政府又推出了“全面二胎”政策，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800万以上，其中“二胎”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提升至2017年的50%左右。

然而，随着近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年轻一代晚婚晚育现象严重，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并没有维持更长时间，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逐年下降，如图2.3所示。由此可见，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在缓解生育率下降方面的效果仍十分有限，尤其是难以提高年轻一代的一胎生育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生育观念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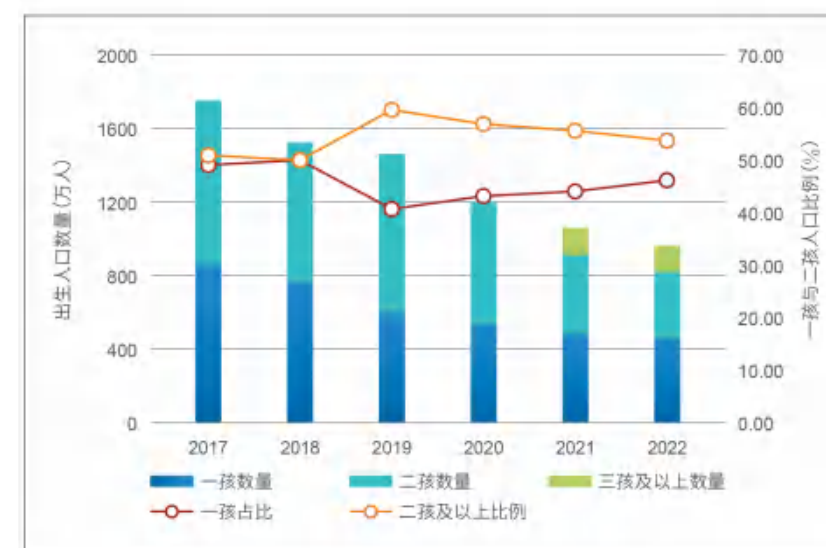


图2.3 2017-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孩次比例

为了进一步激励生育，表明国家希望改善人口问题的决心，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具体包括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和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项重要任务写入党代会报告，明确了生育支持的导向和目标，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有力保障。

目前，“三孩政策”对于减缓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三孩生育本身必须建立在二孩生育的基础之上，而“二孩政策”有限的实施效果决定了符合三孩生育条件的家庭基数较少，因此近两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并没有出现回升。反之，一孩生育数量及占比仍保持下降趋势，说明当前的生育政策还无法对青年群体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如果在未来几年内人口出生率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可以预期在15-20年内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会持续攀升，社会老龄少子化问题会愈发严重，而社会基本养老金的赤字困境也难以改善。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退休准备情况，包括他们对退休生活的预期、计划制定与完善情况以及生育意愿等，由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1.2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失衡，第二、三支柱亟待发展

上世纪末期，世界银行关注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趋势，对很多国家的退休收入体系和制度改革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 1994 年的报告《应对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选择》中首次提出了“三支柱”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如今也被更多地称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并在全球许多国家开展了实践。在我国，第一支柱是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指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而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养老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肯定了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中国不断改革、发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三支柱”养老金的协调发展十分重要。然而，我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建立时间较晚、已有政策落实不够到位，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经过长期探索于 2022 年才正式推出，导致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严重失衡。如图 2.4 所示，在中国全部养老金资产中，第一支柱养老金占据了绝大部分，第二支柱占比相对较小，而第三支柱由于才开始发展，占全部养老金资产的比重几乎为零。同样失衡的是“三支柱”养老金的参与人数，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在 2021 年已经超过 10 亿人，2022 年参保人数进一步提升，达到 10.53 亿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参与人数虽然也逐年提升，但目前覆盖人群仍十分有限。2022 年全国企业年金的参与人数仅有 3010 万人，不足第一支柱的 3%。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当前仅有第一支柱的退休收入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累计资产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中国当前几乎完全采用现收现付制的方式来运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每年收缴上来的绝大部分资金都将作为养老金进行发放，因此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累计速度较为缓慢。然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由于开始时间较晚，在近十年间才迅速扩张，当前第二支柱资产规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缴费导致的现金流入，而养老金给付导致的现金流出很少，因此资产规模在近年来得以迅速扩张，在养老金总资产中的占比提升明显。但实际上，不论是考虑其企业与职工覆盖率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都仍处在较为低下的水平。



图2.4 2013-2022年中国“三支柱”养老金资产规模与参与人数

从绝对数额来看，我国目前的养老金资产积累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居民未来的退休生活需求。

2022 年末，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约 7 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基金积累达约 5 万亿元，二者加和仅占当年 GDP 的约 10%。而同期的美国，其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资产占当年 GDP 的比重超过 150%。相比之下，我国由于第二、三支柱发展还很不充分、积累的资产较少，“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总资产规模也较小，导致未来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有限。

从社会总体层面看，以养老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城镇职工为例，2022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11.4 万元，当年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共支出 5.9 万亿元，有 1.36 亿离退休职工实际领取了养老金，平均每人领取约 4.3 万元，收入替代率仅有 37.7%。对于保障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而言，2022 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支出 4044 亿元，有 1.65 亿离退休居民实际领取了养老金，平均每人当年领取约 2450 元，月收入仅约 204 元。此外，由于保障个人权益性并不是公共养老金的原则，政府可能根据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给付水平。因此，仅依靠第一支柱养老金难以实现充分的养老保障，养老金体系建设需要“三支柱”的协调发展。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10 月，人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具有税收优惠支持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我国正式成立。该制度允许参与者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完全由自身承担，实行完全基金积累。账户中的储蓄享受税收优惠，并且可以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与销售渠道购买养老金融产品。可以预期，个人养老金制度不仅有利于补充对非正规部门人群的养老保障，比如家庭妇女、灵活就业人员等，也能帮助高收入、高净值群体进行更专业、充分的退休准备，在退休后实现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因此，**发展个人养老金对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调研报告的“专题研究”部分，我们将具体考察我国居民目前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和参与情况，针对居民的具体需求，为完善该制度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2.2 项目概况

2.2.1 调研方式及内容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从 2013 年起启动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并连续九年发布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目的是：**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制定和完善员工福利计划，个人制定和完善科学的退休养老计划，提供参考。**

2023 年度为“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持续的第十一年。本次调研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202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和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既能体现当前中国居民退休准备特色、又能与往年调研成果进行纵向比较的“2023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问卷”。

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由瀚一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问卷植入调查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调研家社区”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每位受访者填写完成后可以获得 4 元的现金回报。问卷发放及回收的时间为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共回收有效问卷 4041 份，覆盖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及地区，包括 3637 名在职职工（占比约 90%）和 404 名退休居民（占比约 10%）。本次调研的内容主要包含五个部分：

（1）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区、工作状态、自评健康水平、受雇单位类型、家庭人口结构、学历、收入与资产水平等；

（2）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包括：预期退休年龄、养老方式偏好、对退休生活品质的追求及担忧、对退休生活的信心等；

（3）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包括：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

（4）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包括：养老金积累方式与预期收入来源、具体的财务准备方式、对财务建议的信任程度、对养老咨询服务及金融产品的特色需求等；

（5）专题研究，包括：金融素养、风险态度与时间偏好、老龄风险感知水平、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与参与情况、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等。

根据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报告将从政府可发挥的作用、企业应做出的改善、个人应付出的努力及保险可作为的领域四个方面，为改善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状况提出建议。

2.2.2 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得到了 4041 个有效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情况与代表性分析如下：

（1）受访者回答问卷的平均时长为 18 分钟，其中最短用时为 8 分钟，总体上受访者在答题过程中经过了一定时长的阅读与思考，回答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受访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均衡，5 个年龄段受访者的占比均为 20% 左右，其中 26-35 岁受访者占比最多；总体上，男女受访者占比相等，25 岁及以下受访者的青年受访者中女性占比更多，而 36-55 岁间的中年受访者中男性占比更多；见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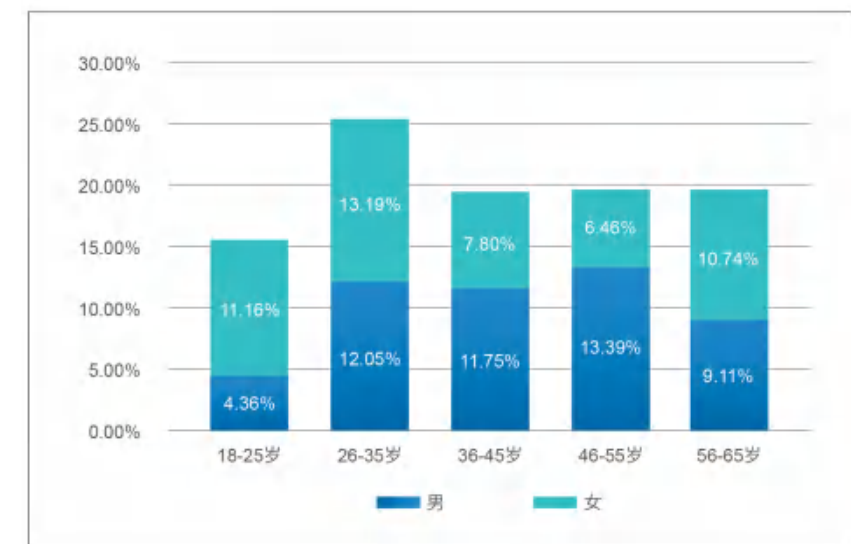


图2.5 受访者年龄与性别分布

(3) 受访者的学历背景以高中和大学本科为主，二者合计占比超过 70%；初中及以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均占比较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见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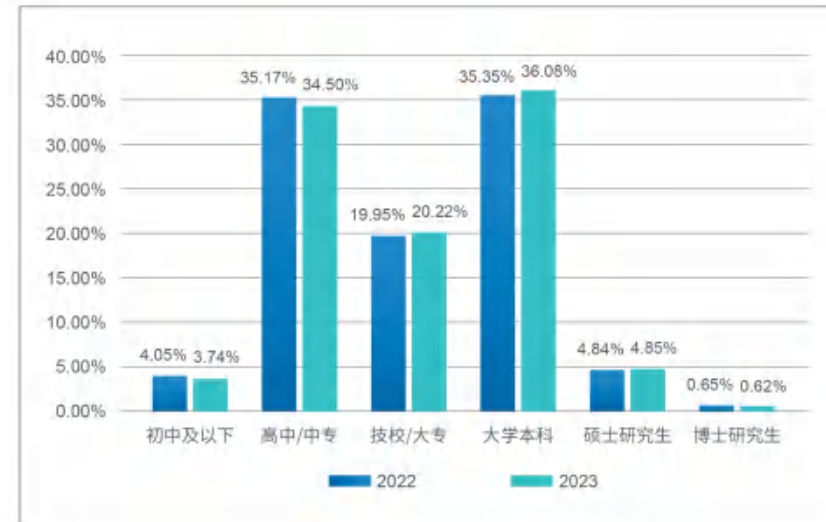


图2.6 受访者学历背景分布

(4)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接近 70%；离婚、丧偶的受访者占比极少，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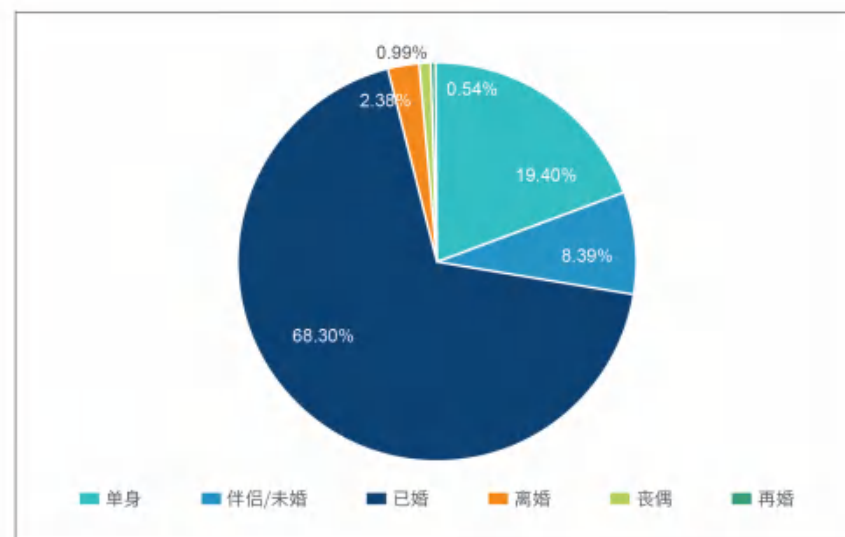


图2.7 受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5) 受访者的受雇单位以私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主，总共占比超过 80%。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私营企业工作者都是占比最大的；见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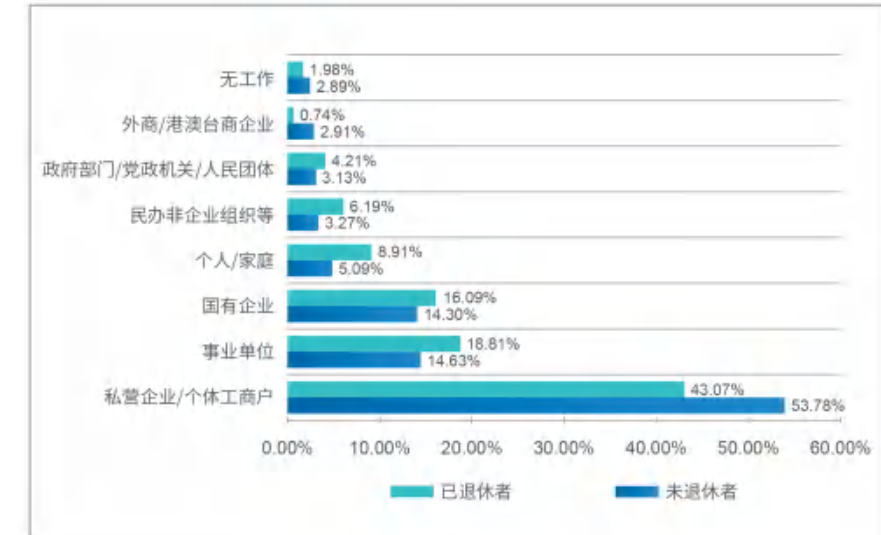


图2.8 受访者受雇单位分布

(6) 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分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维度，对自我的评价都以“比较好”和“一般”为主；总体上，受访者对自身心理健康的评价高于身体健康，说明受访者在心态上对自身的健康水平更为积极乐观；见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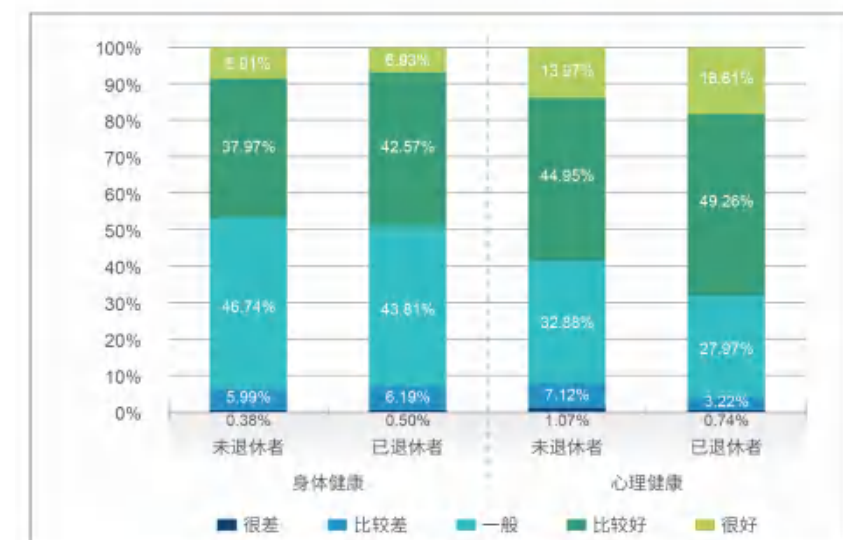


图2.9 受访者自评健康水平分布

(7) 受访者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其中沿海地区受访者占比较大，如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等；见图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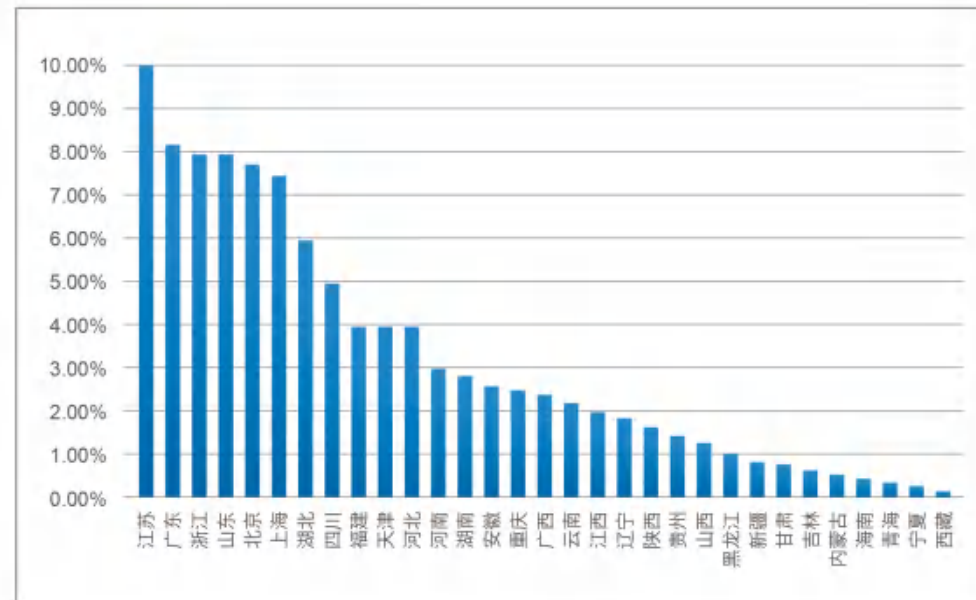


图2.10 受访者地域分布

(8) 受访者的个人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8.79 万元，中位数为 7 万元，最大值为 100 万元，最小值不到 1 万元；从分布来看，75.90% 的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仅 4.60% 的受访者个人年收入高于 2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21.16 万元，中位数为 15 万元，最大值为 5000 万元，最小值为 1 万元；其中，73.22% 的受访者家庭税前年收入不超过 20 万元，仅有 2.72% 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高于 50 万元；见图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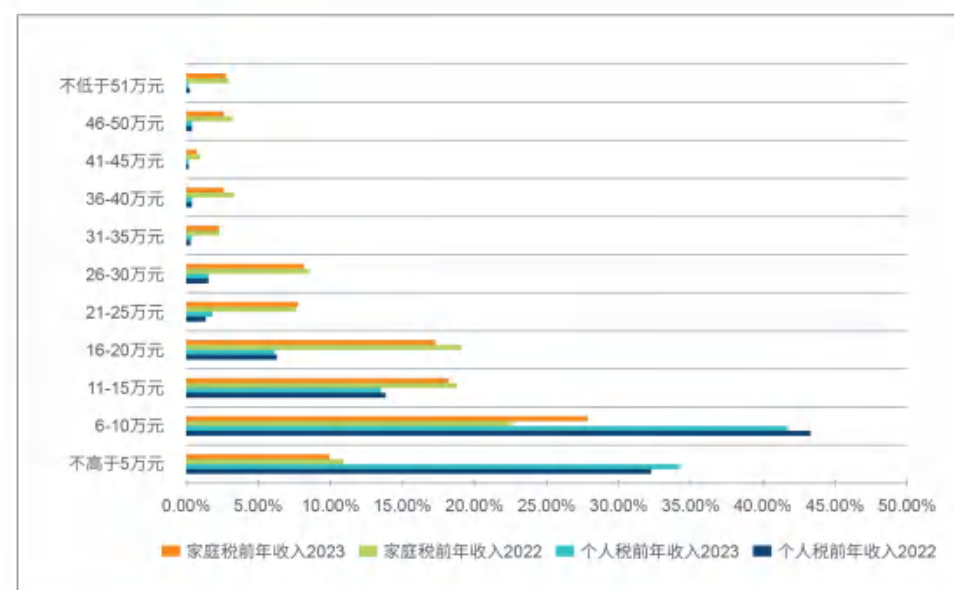


图 2.11 受访者收入水平分布

(9) 受访者的家庭资产总额（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普遍低于 300 万元，仅有 14.85% 的受访者家庭资产高于 300 万元；受访者的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包括固定收益型、权益投资型和风险保障型金融资产）普遍低于 50 万元，仅有 17.17% 的受访者家庭金融资产高于 50 万元；见图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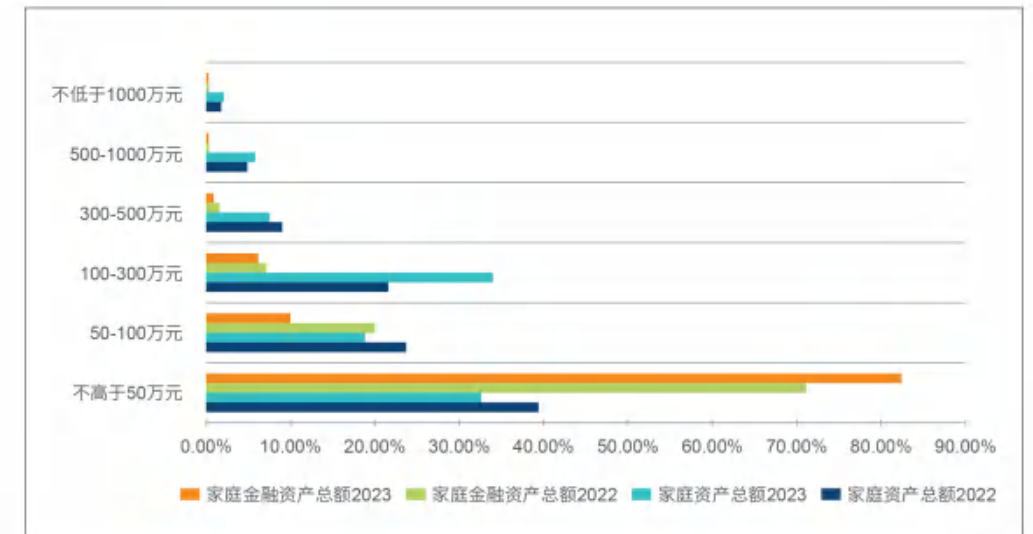


图2.12 受访者资产水平分布



(10) 受访者基本信息具体的描述性信息见图 2.13。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占比
年龄	4041	100.00%	受雇单位	4041	100.00%
18-25 岁	627	15.52%	政府部门 / 党政机关	131	3.24%
26-35 岁	1020	25.24%	事业单位	608	15.05%
36-45 岁	790	19.55%	国有企业	585	14.48%
46-55 岁	802	19.85%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	2130	52.71%
55-65 岁	802	19.85%	外商 / 港澳台商企业	109	2.70%
性别	4041	100.00%	民办非企业组织	144	3.56%
男	2047	50.66%	个人 / 家庭	221	5.47%
女	1994	49.34%	无工作	113	2.80%
学历水平	4041	100.00%	婚姻状况	4041	100.00%
初中及以下	151	3.74%	单身	784	19.40%
高中 / 中专	1394	34.50%	伴侣关系 / 未婚	339	8.39%
职业技术学校 / 大专	817	20.22%	已婚	2760	68.30%
大学本科	1458	36.08%	离婚	96	2.38%
硕士研究生	196	4.85%	丧偶	40	0.99%
博士研究生	25	0.62%	再婚	22	0.54%
自评身体健康水平	4041	100.00%	自评心理健康水平	4041	100.00%
很差	16	0.40%	很差	42	1.04%
比较差	243	6.01%	比较差	272	6.73%
一般	1877	46.45%	一般	1309	32.39%
比较好	1553	38.43%	比较好	1834	45.38%
很好	352	8.71%	很好	584	14.45%
个人税前年收入	4041	100.00%	家庭税前年收入	4041	100.00%
不高于 5 万元	1381	34.17%	不高于 5 万元	405	10.02%
6-10 万元	1686	41.72%	6-10 万元	1123	27.79%
11-15 万元	545	13.49%	11-15 万元	733	18.14%
16-20 万元	243	6.01%	16-20 万元	698	17.27%
21-25 万元	70	1.73%	21-25 万元	310	7.67%
26-30 万元	62	1.53%	26-30 万元	332	8.22%
31-35 万元	13	0.32%	31-35 万元	88	2.18%
36-40 万元	13	0.32%	36-40 万元	106	2.62%
41-45 万元	5	0.12%	41-45 万元	31	0.77%
46-50 万元	15	0.37%	46-50 万元	105	2.60%
不低于 51 万元	8	0.20%	不低于 51 万元	110	2.72%
家庭资产总额	4041	100.00%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	4041	100.00%
不高于 50 万元	1317	32.59%	不高于 50 万元	3347	82.83%
50-100 万元	759	18.78%	50-100 万元	405	10.02%
100-300 万元	1365	33.78%	100-300 万元	245	6.06%
300-500 万元	294	7.28%	300-500 万元	26	0.64%
500-1000 万元	227	5.62%	500-1000 万元	9	0.22%
不低于 1000 万元	79	1.95%	不低于 1000 万元	9	0.22%

图 2.13 受访者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

为了确认本次参与调研的受访者的代表性，我们将样本统计数据与全国人口及往年调研的相关数据分布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本年参与调研的样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方面均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具体而言，本次参与调研的受访者在年龄结构上更加年轻化，符合本次调研着重关注青年群体的调研目标；在地域上更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本次调研的结论对于了解具有小康生活水准的城镇居民的退休准备更具有参考意义。**

此外，本次调研样本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与 2022 年调研样本基本保持一致，但低于 2021 年及以前调研的样本。以收入水平为例，本次调研受访者个人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8.8 万元，与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相近，略低于 2022 年受访者个人收入的均值（9.2 万元），仅达到 2021 年受访者收入均值的约 50%；本次调研受访者家庭税前年收入的均值为 21.2 万元，略高于 2022 年受访者家庭收入的均值（19.5 万元）。因此，在对调研数据尤其是计算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进行纵向比较时，应当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差异。我们认为，**根据本次调研样本与计算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与 2022 年的结果基本可比。**

03·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

0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

3.1 退休生活愿景

3.1.1 退休年龄预期：年轻人期待早退休，高学历人群偏向晚退休

此次调研中，**未退休受访者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 58.01 岁**。从年龄分组看，除了 56 岁以上的受访者外，其他各年龄组的期望退休年龄均保持在 56-58 岁之间。

在不同年龄组中，较年轻群体表现出较早退休的平均期望，表明**年轻人普遍预期较早退休**，特别是年龄介于 18 到 25 岁之间的男性受访者的平均期望退休年龄为 58.81 岁，明显低于法定退休年龄，表明不少年轻男性受访者希望提前退休。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可能会出台延迟退休政策。《“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我国将会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年轻人目前的退休期望与未来的延迟退休趋势尚未完全吻合，因而需要调整居民的退休预期，以利于未来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实施。

年龄在 56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普遍预期在 62 岁左右退休，这一预期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高龄未退休受访者更了解和关注退休政策，因此对延迟退休政策有更理性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表明高龄未退休者具有更强的工作意愿、工作能力、工作信心以及继续工作以满足退休储蓄方面的需求，从而导致他们预期较晚退休。这一群体的平均期望退休年龄表明，**即使拥有高度的工作意愿和继续工作的能力，人们的退休年龄预期也很难超过 6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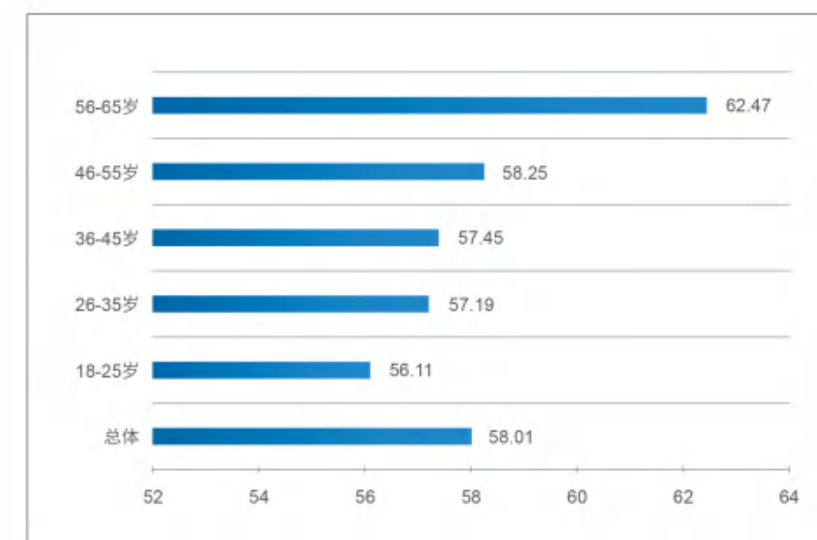


图3.1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

不同学历水平的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这三个群体中，学历越高的受访者倾向于更晚退休。其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8.4 岁，这一水平与全国平均较为接近。相比之下，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只有 57.1 岁，而博士研究生的退休年龄预期为 61 岁。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高学历人群更有意愿延迟自己的退休年龄。

职业技术学校 / 大专毕业生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8.3 岁，和硕士研究生相近，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对职业技术学校 / 大专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该类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得到提升，接近社会平均就业水平，因此预期退休年龄也与社会平均水平接近。高中 / 中专学历群体的预期退休年龄为 59.2 岁，可能与该类毕业生的收入较低、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来赚取足够的养老金有关。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预期退休年龄最低，为 55.7 岁，可能的原因是该群体从事个体工商户（自雇）的比例较大，退休时间较自由，退休时间普遍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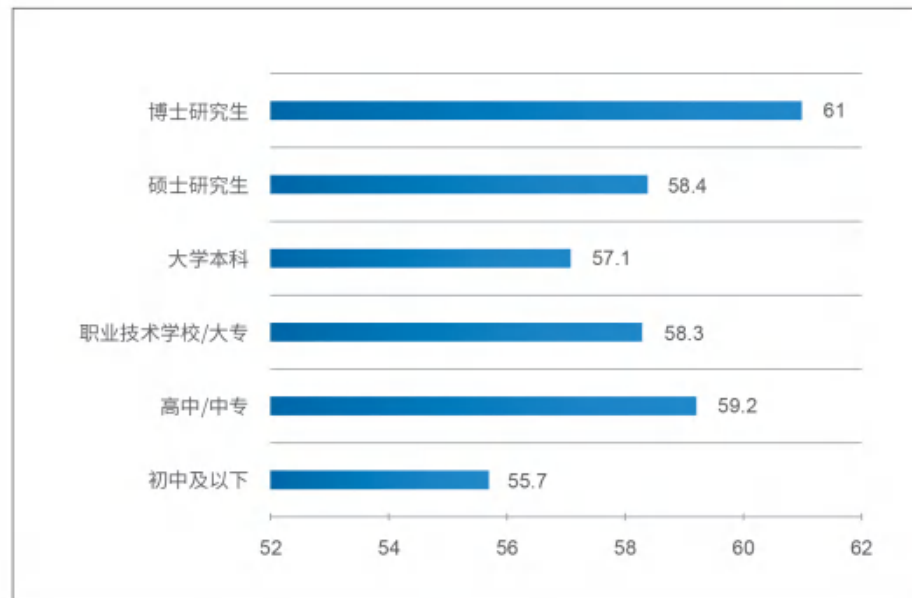


图3.2 不同学历水平受访者的平均预期退休年龄

3.1.2 养老方式偏好：家庭养老仍为主流

居民对于养老方式的偏好在他们的退休愿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的养老方式偏好会驱使人们采取不同的退休准备措施，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了解人们希望如何度过退休生活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本次调研中，我们向受访者提供了五种养老方式选项，分别是社区居家养老、传统家庭养老、家庭护理养老、社会机构养老、商业机构养老，目的是了解受访者的养老方式偏好。调查结果显示，48.7% 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度过晚年，**而且在各年龄段受访者中，传统家**

庭养老方式都是首要选择。另一个主要选择是社区居家养老，有 27.3% 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项，还有 9.6% 的受访者选择了家庭护理养老。因此，总计有 85.6% 的受访者希望在家庭中度过退休生活，表明中国居民强烈的家庭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养老方式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于家庭养老的不同方式（社区居家养老、传统家庭养老、家庭护理养老）有略微不同的偏好。**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传统家庭养老，表明高龄居民更加依赖和信任家人和子女的照顾。**社区居家养老在 26 岁到 35 岁和 36 岁到 45 岁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中更受欢迎，分别占比 30.4% 和 29.9%，说明年轻和中年居民对政府和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更加接受。

社会机构养老和商业机构养老这两种新兴养老方式在中国尚未成为主流选择。然而，随着受访者年龄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两种养老方式，表明**在年轻一代中，愿意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度过退休生活的接受度正在提高。**与社会机构相比，受访者更加信任商业机构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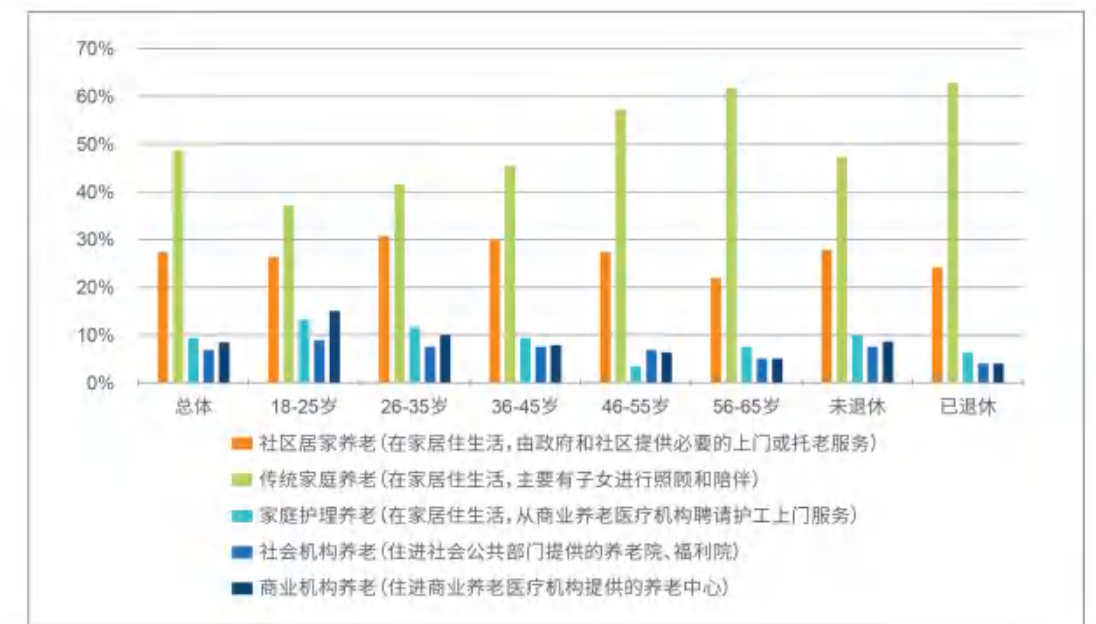


图3.3 受访者对于不同养老方式的偏好

3.1.3 退休生活品质：医疗服务和家人陪伴最受重视

为直观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愿景，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请受访者选择他们最看重的退休生活品质，选项包括退休后可以从事的活动，如继续工作学习、旅行等，以及与退休生活质量相关的客观物质条件，如医疗服务、居住环境、资金保障等。

调查结果显示，**66% 的受访者将完善的医疗服务视为他们最注重的退休生活品质，这使其成为调查中最受关注的因素。**其次是拥有良好的居住和服务设施，以及与家人共度时光，分别

获得了 69% 和 50% 的受访者选择。相比之下，受访者对于退休生活中继续学习、旅行、社交等充实生活的活动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影响退休生活品质的最大因素是退休后能否获得满足基础需求的医疗和居住条件的保障。

可能出于对家人的信任、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与家人共度时光的心理需求等原因，高达 50% 的受访者认为与家人共度时光非常重要。**已经退休的人格格外关注是否能够与家人一起生活**，有 58% 的已退休受访者选择了这一品质，远高于未退休者中的 49%。此外，已退休的人也更加希望在退休后能够享有充实的社交生活。

未退休的受访者更加关注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有 31% 的未退休者将其列为自己最注重的退休生活品质，相比之下，已退休者关注这一因素的比例只有 26%。由于未退休者仍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管理和储蓄来确保在退休后拥有充足的资金，这种财务规划意识和理财需求可能使他们更加关注退休后的资金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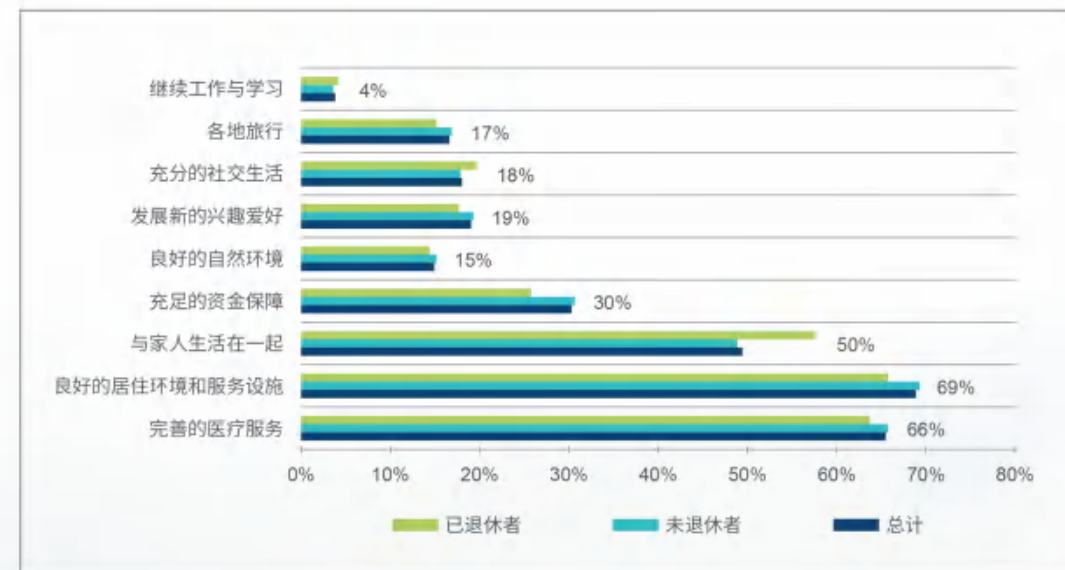


图3.4 受访者最为看重的养老生活品质

3.2 退休生活信心

3.2.1 退休生活担忧：身心健康问题易引发困扰

居民的退休信心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疫情后遗症的影响，居民可能会受到身体健康状况下滑、生活状态改变等问题的困扰，从而担心自己的退休生活。通过调查居民对于退休生活担忧的来源，我们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居民的退休信心产生影响。

在问卷中提供的众多选项中，**最让受访者担忧的问题普遍涉及身体健康方面**。有 6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忧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59% 的受访者担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每况愈下。此外，有 28% 的受访者担心他们在退休后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这表明，如果社会机构和商业机构能够提供完善且负担得起的医疗、体检、康复和护理等健康相关服务，将有效提高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水平。

与已退休的居民相比，未退休的居民更容易为退休后的支出感到担忧。有 29% 的未退休受访者担心在退休后无法支付医疗和护理费用，17% 的未退休受访者担心在退休初期就用完了养老储蓄，这两个比例均明显高于已退休者。这再次强调了未退休者更加关注退休后的财务问题。



已退休的居民对于缺乏陪伴和社交的担忧程度高于未退休的居民。除身体健康相关因素外，已退休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子女陪伴、亲人团聚机会减少”。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忧在未退休的居民中明显较低，这表明未退休的人可能忽视了退休后可能面临的缺乏陪伴和其他家庭和心理因素。已退休者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感受更深刻地意识到了退休生活中的困扰和担忧，因此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上述结果强调了居民在退休准备和规划时应重视满足退休后的陪伴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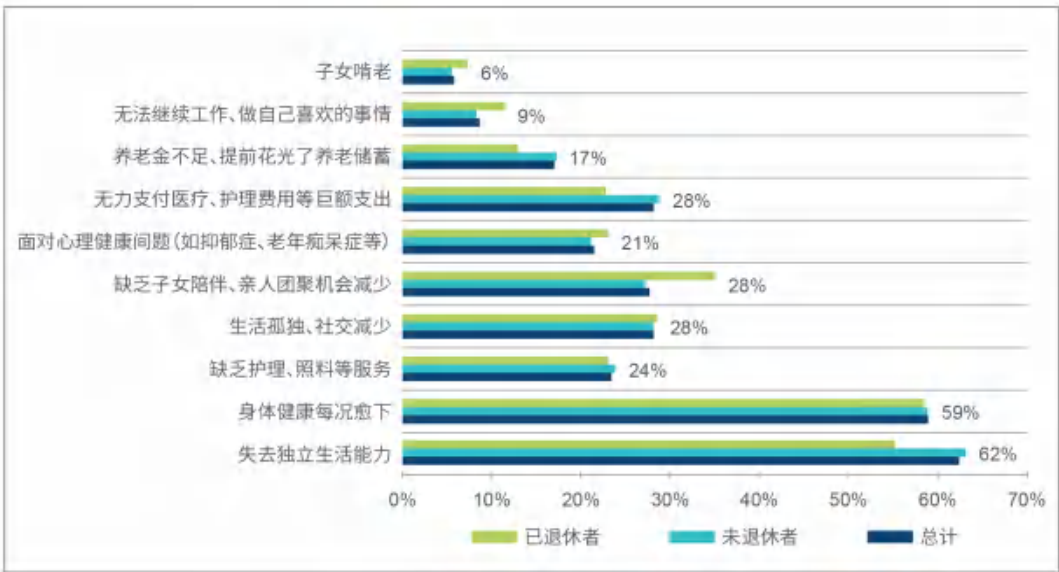


图3.5 受访者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因素

3.2.2 退休生活信心：疫情影响尚未恢复，对下一代的看法存在分化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还设置了更直接的问题，以了解受访者对于能否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主观信心程度，这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退休生活信心。结果显示，有 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完全有信心能够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而有 38%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比较有信心。大多数受访者给出了相对中性的回答，只有 16% 的受访者对于他们的退休生活前景感到悲观。2022 年的调研结果显示，疫情导致大部分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水平有所降低。相比之下，本次调研中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说明疫情对居民信心的影响尚未完全恢复。

然而，**关于他们下一代人能否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看法更加多样化。**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他们对于下一代人能否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程度。总计有 46% 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有信心或完全有信心，这一比例高于他们对自己的退休生活信心的比例。同时，有 21% 的受访者对于下一代的退休前景没有信心，这一比例也高于他们对自己的退休生活信心的比例。这表明受访者对于下一代的退休前景持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家庭和未来的信心存在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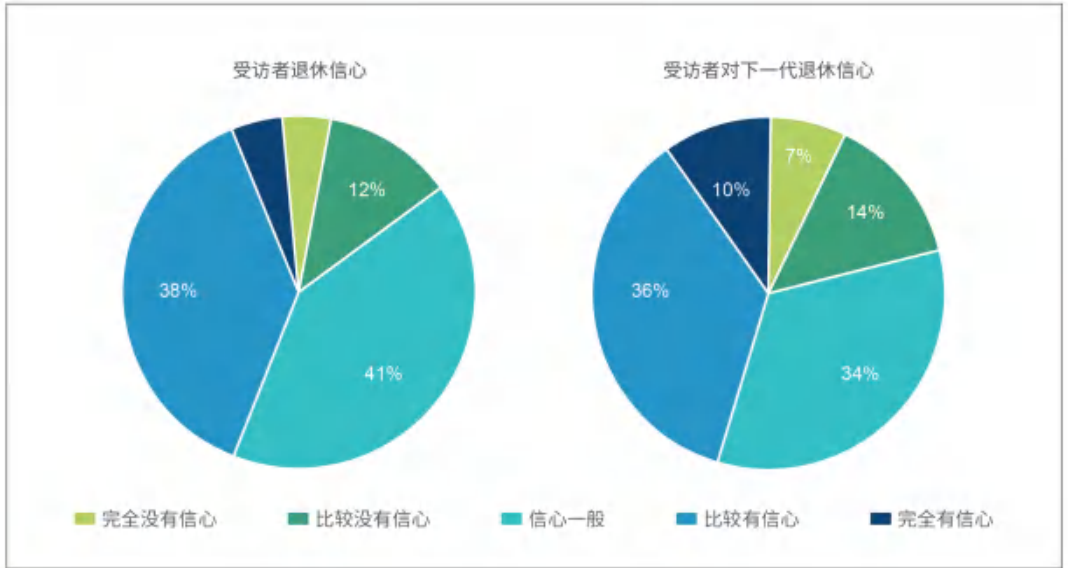


图3.6 受访者对于自己和下一代人群的退休信心水平



0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4.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测算

为了科学地分析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我们沿用了历年选取的六个维度，采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六项指标并分别赋以相应的权重，计算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退休准备指数的理论取值为 0-10，数值越大意味着退休准备越充分，其中数值 8-10 为高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非常充分；数值 6-8 为中等退休准备指数，表明已经有了一定的退休准备，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值低于 6 为低退休准备指数，表明退休准备不足，需要引起重视。

4.1.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

为了贴合中国居民生活实际，对六个维度上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的衡量，2023 年我们在历年问卷基础上对相关问题的提问方式及回答选项进行了适当修改，修改后的问卷参见附录。

我们采用专家法，综合十二位学界与业界专家的意见，确定了构成退休准备指数的六项指标的权重：退休责任意识（16.25%）、财务规划认知水平（18.75%）、财务问题理解能力（13.75%）、退休计划完善度（17.50%）、退休储蓄充分度（22.92%）、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10.83%）。对每一项指标根据受访者的回答选项，分别赋值 0、2.5、5、7.5、10，数值越大，代表受访者在该维度上的退休准备越充分。据此，将所有受访者的加权平均汇总，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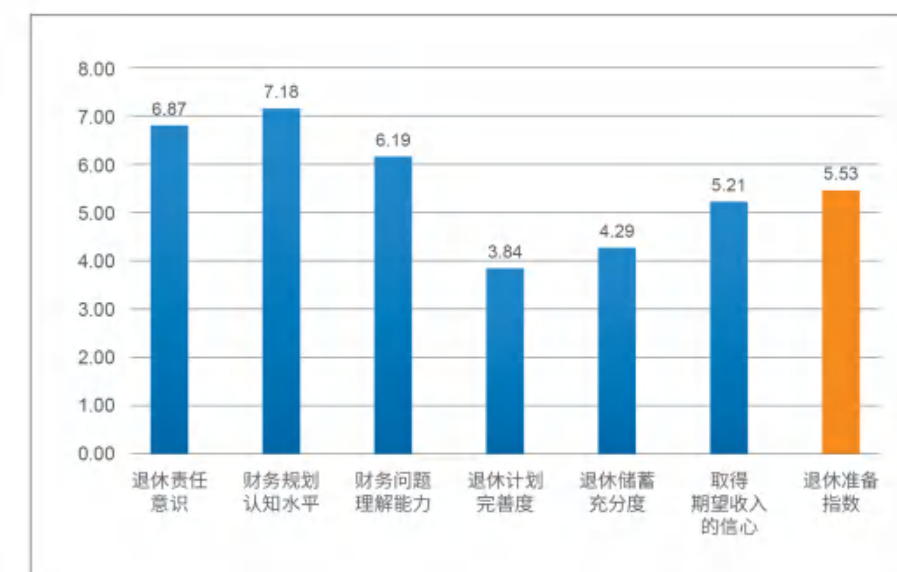


图4.1 2023年六个构成维度及总体退休准备指数数值

计算得出：**2023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53**，低于 2022 年的水平（2022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 5.70），且在六个维度上均有一定下降，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下降最多，从 2022 年的 4.19 下降到 2023 年的 3.84，是导致整体指数下降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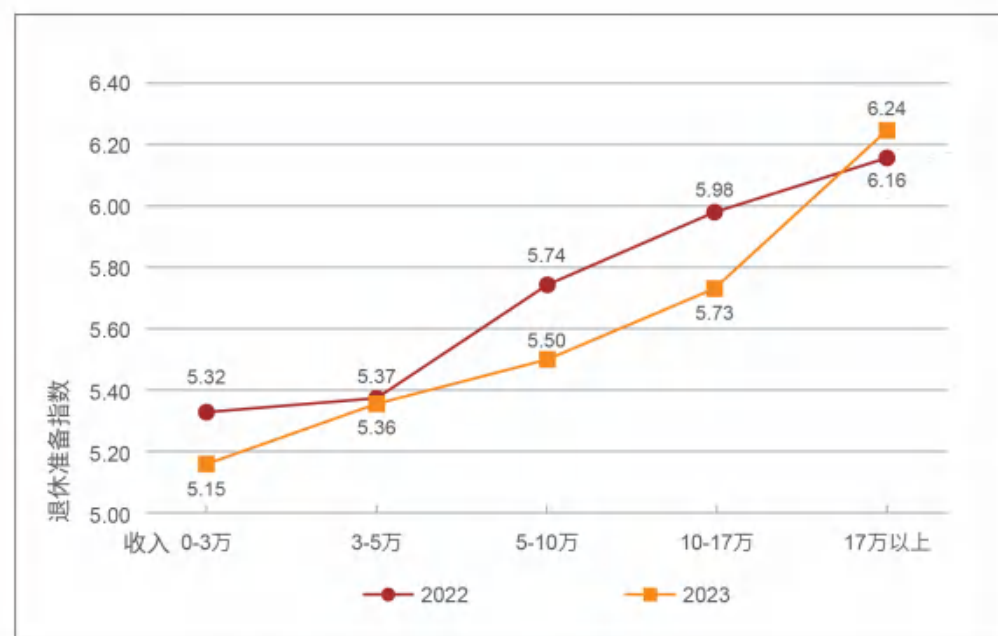


图4.2 2022和2023年不同收入人群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值对比

如果考察不同收入人群的退休准备指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图 4.2）：2023 年低收入组（年收入 0-3 万）和中等及中上收入组（年收入 5-10 万和年收入 10-17 万）人群的退休准备指数下降明显，而中低收入组（年收入 3-5 万）和高收入组（年收入 17 万以上）人群的退休准备指数变化不大。

4.1.2 退休准备指数六个维度的变化

2023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六个构成维度上不同分数段的人数比例相对 2022 年有所变化（图 4.3 至图 4.5），其中：处于“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高分段人群比例有小幅下降，低分段人群比例有小幅提高，说明被调查人群在财务规划和财务问题的理解方面变化不大；处于“退休责任意识”、“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中低分段人群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说明相较于 2022 年，居民退休准备更加不充分，对退休后能取得满意退休收入的信心不足，需要引起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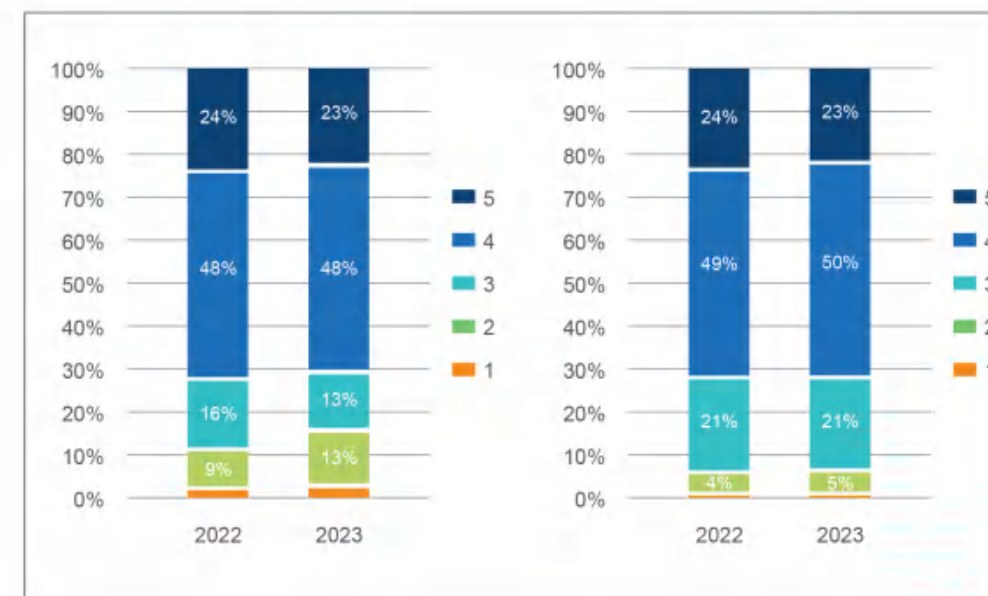


图4.3 退休责任意识（左）与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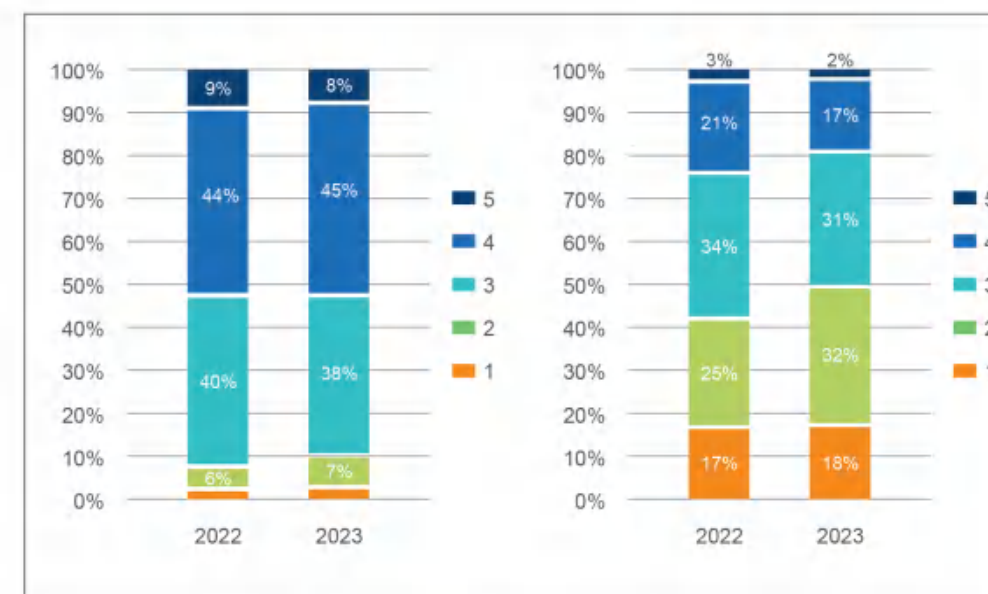


图4.4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左）与退休计划完善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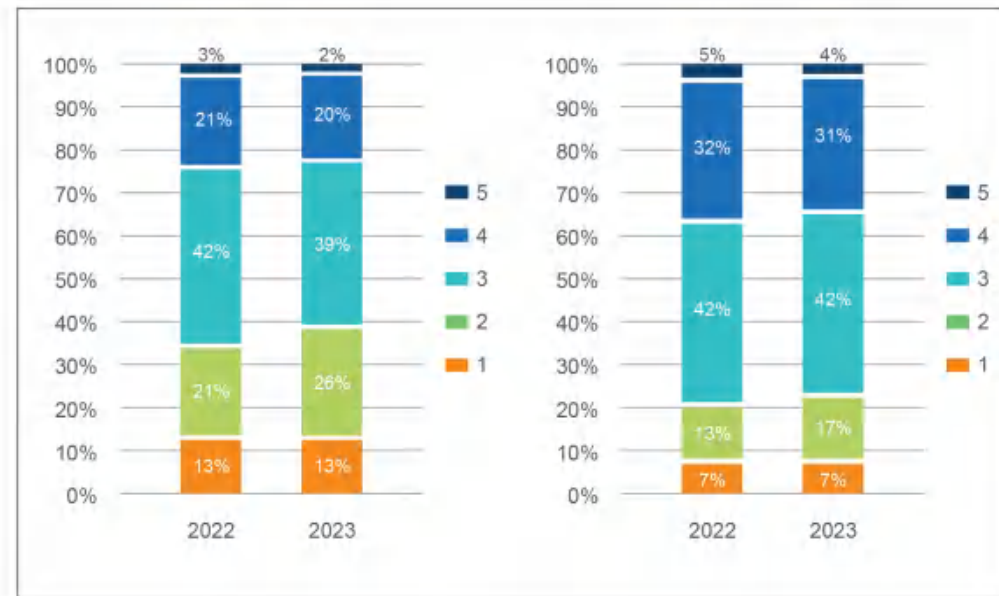


图4.5 退休储蓄充分度（左）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右）

通过计算六个维度对退休指数下降的贡献，我们发现与2022年相比，2023年退休准备指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退休责任意识”、“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下降，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退休计划完善度”，占有下降因素的百分比为36.20%，“退休储蓄充分度”和“退休责任意识”分别对退休准备指数下降贡献度为20.77%和19.64%，三者共同贡献占到所有下降因素的76.61%。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受访者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性增加；另外，受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个人退休计划需要重新制定；由于个人收入下降或失业可能性增加，受访者开始注意到退休储蓄不足的问题，并且这样的短期的冲击使得个人更倾向寄希望于政府提供更多的退休收入和保障。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只要个人积极承担责任，进行退休准备规划，这些情况将呈现稳步向好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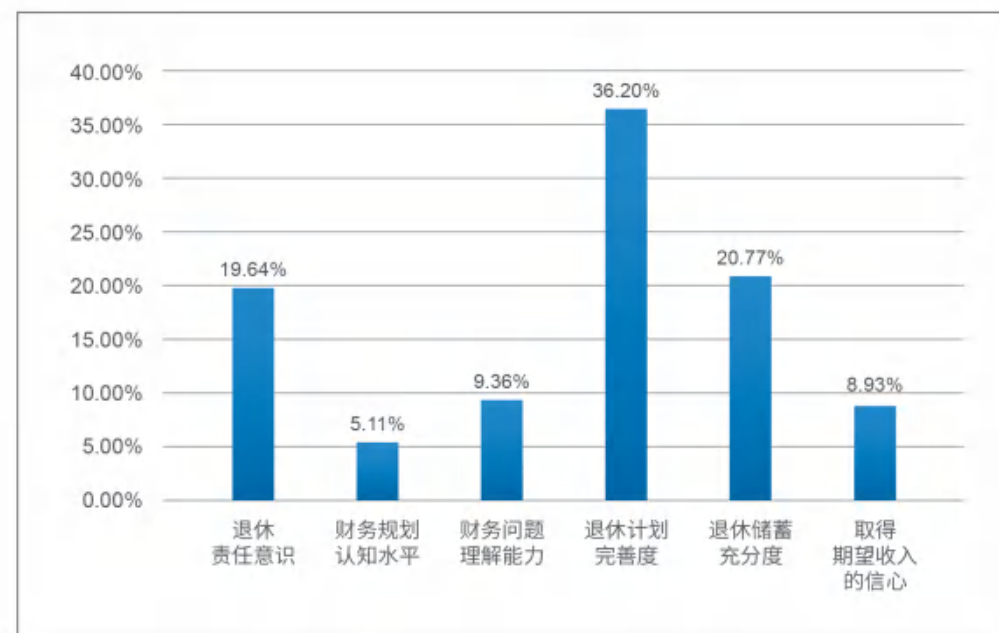


图4.6 六个维度对2023年退休指数下降的贡献

4.1.3 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的比较

为比较不同地区居民退休准备情况，我们分别测算了各省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如图4.7所示，不同省份间的差异引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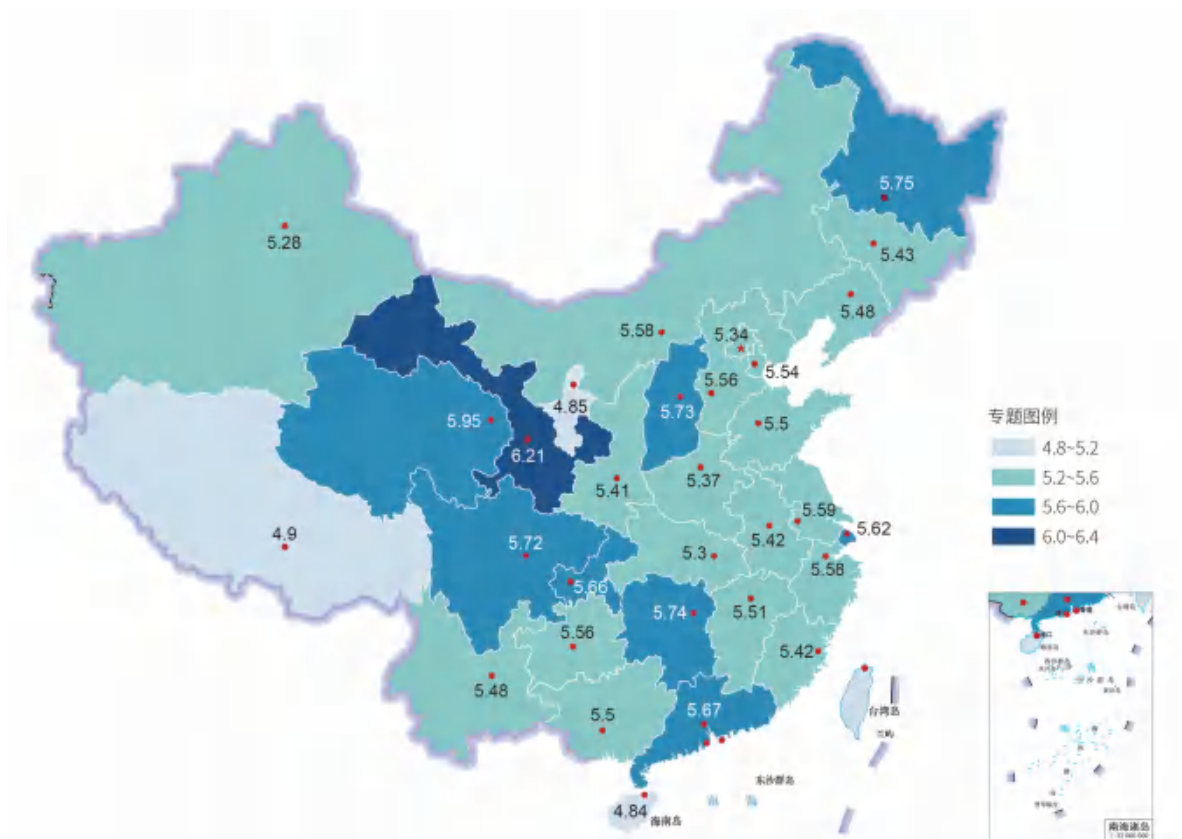


图4.7 2023年中国大陆各省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与2022年相比，大多数省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均有所下降，部分西部省份如青海、甘肃有所上升，但由于这些省份样本量过小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根据排序差异和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下降的程度，我们关注到不同省份居民退休准备状况的一些变化。

从指数变化幅度来看，东部2022年退休准备指数较高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降幅较大，整体上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2022年平均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的前五名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安徽、哈尔滨、浙江、江西的退休准备指数在2023年分别下降了0.93、0.70、0.36、0.50、0.42。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的退休准备指数集中在5.2-5.6的分数段，各省级行政区退休准备指数趋于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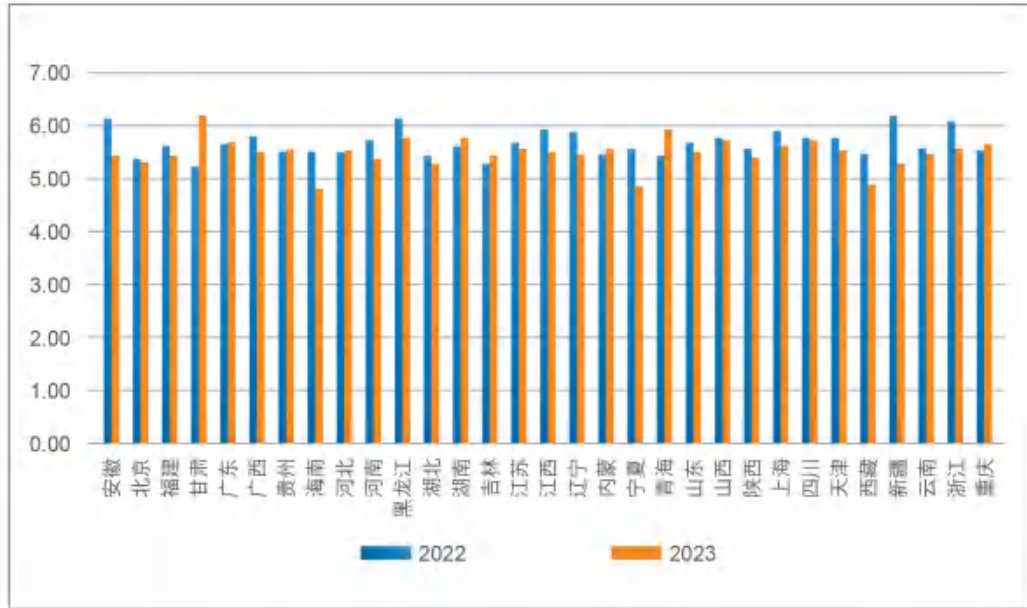


图4.8 2022年和2023年我国参与调研的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对比

4.2 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根据2023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结果，中国高退休准备指数人群具有部分相似特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临近退休的男性退休准备指数更高；已婚且养育两个子女的个人指数更高；身心健康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学历高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国有企业及外商/港澳台商员工退休准备指数更高；高收入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整体来看，高准备指数人群具有**男性、临近退休、已婚且养育两个子女、身心健康、学历高、在国有企业及外商/港澳台商工作、高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等特征。在下文中，我们将对高准备指数人群的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4.2.1 个人特征：临近退休的男性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2023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男性略高于女性。从性别差异来看，“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三个方面女性受访者是明显优于男性的，这与受访者中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男性是相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意识到个人的退休准备的责任，并且对于财务问题的理解也更清晰，这一特点与去年的情况相同。“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三个方面男性受访者明显优于女性受访者，这可能与收入水平和波动相关，男性平均收入较高、消费较低且可以从事更多体力劳动，因而储蓄更多且失业期较短，收入波动性更小，退休计划更不容易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女性受访者可能更多地担心由于收入波动影响自己的生活及储蓄水平，并且对自己的退休准备计划顺利完成的可能性更多地持悲观态度，因而退休准备指数下降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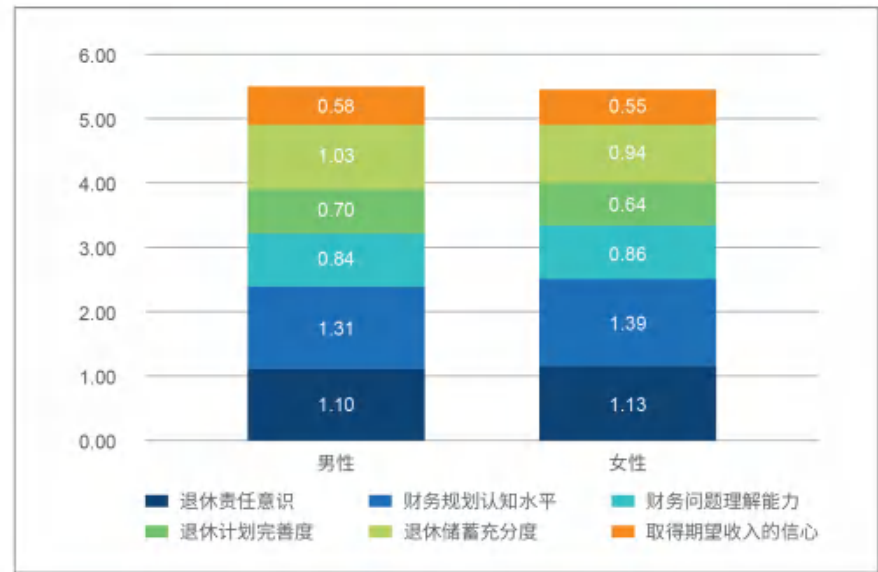


图4.9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在年龄方面，年轻人退休准备认知水平更高，年长者退休准备行为做得更好，总体而言临近退休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更高。18-25 岁的年轻受访者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只有 5.34，而 56-65 岁的临近退休的人群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则为 5.68。年轻群体的“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三个认知维度的平均值均高于中年群体，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家庭与社会金融教育做得不错，有助于年轻人提前意识到个人的退休准备责任，并积极进行财务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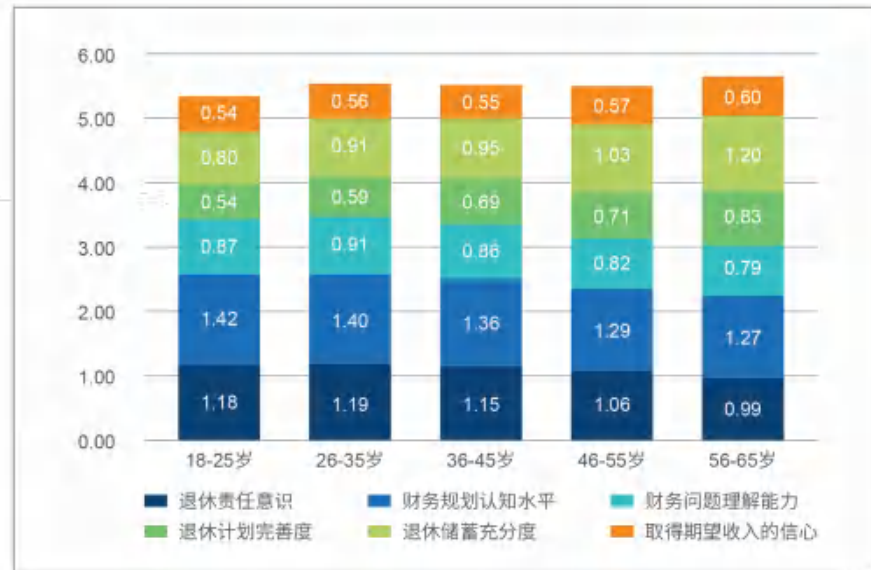


图4.10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2 家庭特征：已婚且养育两个子女的个人指数更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已婚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离婚、丧偶、再婚的群体退休准备指数较低。结婚后，相比于单身或者恋爱时期，人们看到的问题更现实，同时未来生活的确定性增加，使得已婚人士可以对未来进行财务规划和人生规划，为接下来的生活做出有序的规划。同时，一个幸福的家庭可以促进所有家庭成员有意识地合理规划收入和支出，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从而具有更高的退休储蓄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而那些离婚、丧偶或再婚的人更有可能因为失败的婚姻或家庭生活的影响而打乱了其原有的退休准备计划，因此社会不仅应当关注婚姻和生育，更需要关注婚姻不幸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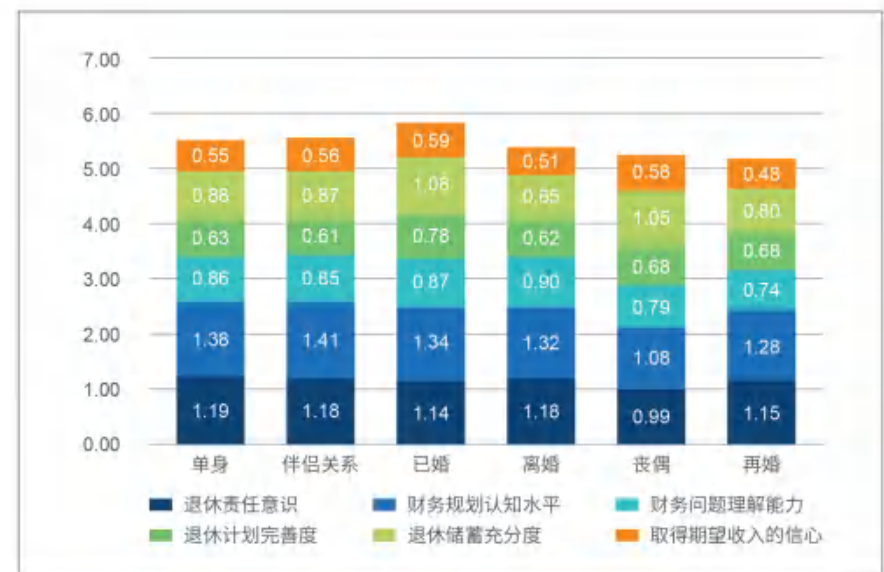


图4.11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养育两个子女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最高。适当地生育能够唤醒个人的储蓄意识，有子女的受访者的退休储蓄水平显著高于无子女的退休储蓄水平。在家庭有了子女后，个人也能更有意识地制定退休计划，因而退休准备更完善。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准备指数最高的是养育两个子女群体，相比于养育一个子女群体他们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并没有更低，并且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的平均分都更高，说明养育两个子女的家庭平均来看比养育一个子女的家庭退休准备并没有表现出更加吃力，可见受访者中养育二孩的家庭平均生活水平和退休准备水平更高。与之相对比的是，养育三个孩子的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明显更低，这说明了生育应当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在家庭能力范围内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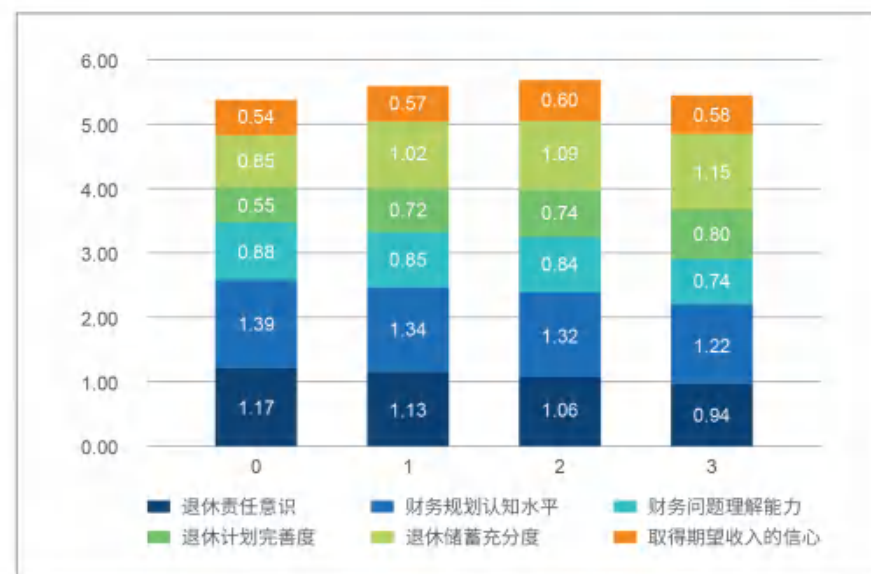


图4.12 养育不同数量子女的群体的平均退休准备指数

4.2.3 健康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对受访者退休准备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准备指数越高。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差的群体在“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三个维度都有明显的不足，他们不好的身心健康状态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收入，并且他们可能伴随着更多地烦恼，他们更需要解决好当下自己面临的问题，而退休准备则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收入以使得自己有结余进行储蓄和规划。



图4.13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图4.14 不同心理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4 教育特征：学历越高，退休准备指数越高

总体而言，学历越高，退休准备指数越高，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显著高于本科以下学历的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般对退休准备和财务问题的相关概念有更清晰的理解，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因此他们会有更强的退休准备意愿，也会有更强的信心获得满意的预期退休收入。



图4.15 不同学历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5 工作特征：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指数更高

国有企业及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无工作者退休准备指数较低。国有企业通常有更加稳定的收入，且职业规划清晰，因此更加易于对未来的退休生活进行合理的计划，并且由于国有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员工福利待遇与多方位的保障，在企业营收及员工收入方面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小，因此，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准备更有保障。而与之相对比，以个人或家庭为工作单位的群体及无工作者收入波动较大，部分甚至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没有足够的积蓄来保证未来的退休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外商 / 港澳台商员工的退休准备指数也明显超过了其他工作特征的平均水平，整体退休准备意识明显优于其他工作特征的受访者，因此在退休准备意识的培养方面企业应多向优秀外商 / 港澳台商学习。



图4.16 不同工作特征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4.2.6 收入特征：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退休准备指数正相关

研究发现，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高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更高。我们根据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从低到高分成 15 组，分别计算了每个收入组的退休准备指数，并绘制了不同个人收入组人群和不同家庭收入组人群的退休准备指数散点图（图 4.17、图 4.18）。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与退休准备指数呈正相关，即高收入人群通常能够做出更多的退休储蓄，自觉地进行退休规划，积极地进行资产配置，对退休后的预期收入有充分的信心，因此退休准备更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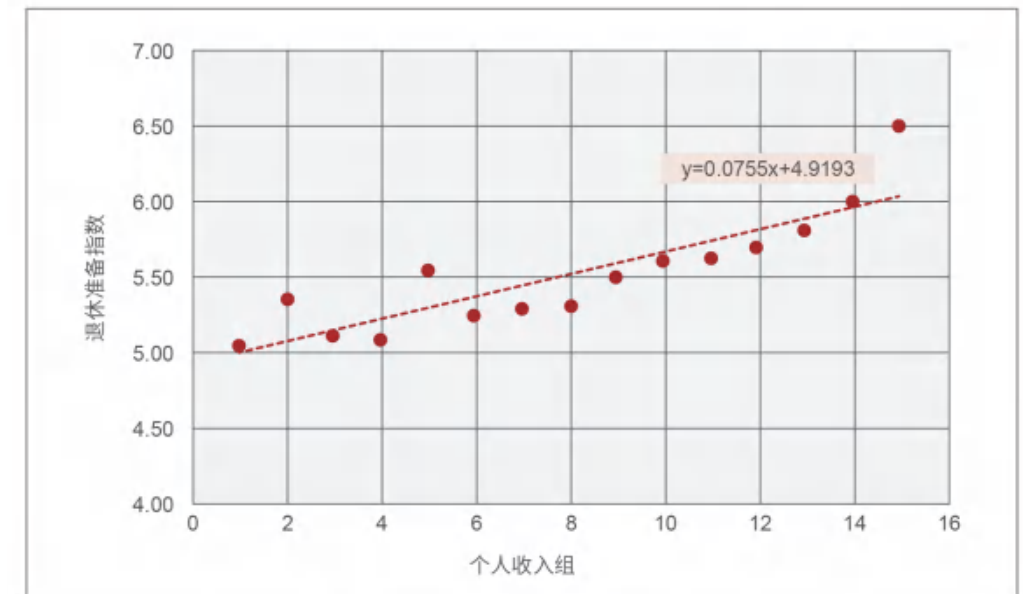


图4.17 不同个人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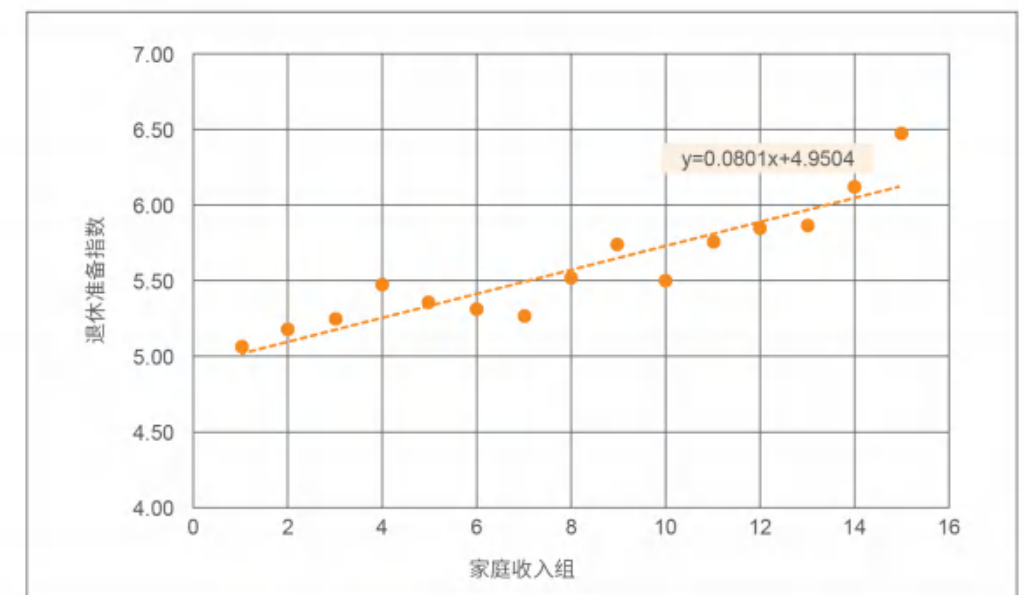


图4.18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05. 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本节将基于问卷调查结果，从退休收入来源、退休财务准备方式和退休财务准备需求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现状，以期为保险业和养老相关产业给出相关产品设计和服务方面的建议。

5.1 退休收入来源

5.1.1 居民退休收入：“三支柱”体系

政府、企业、个人是退休收入的三大来源，也称为“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政府建立的公共养老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特征是“强制”和“普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雇佣关系的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群为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2022 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共 10.54 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5.04 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5.50 亿人。第二支柱是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建立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职业养老金，其特征是“自主”和“补充”。企业年金是面向企业、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单位的人员，职业年金是面向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截止 2022 年底，共 12.80 万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 3010.29 万人。第三支柱是个人通过购买各类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自愿建立的个人养老金，其特征是“自愿”和“市场化”。以养老目标基金为例，截止 2022 年底，共成立了 200 只养老目标基金，包括 88 只目标日期基金和 112 只目标风险基金，总规模合计 929 亿元。

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三支柱养老体系发展并不均衡，根据人社部的调查数据，截止 2021 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养老基金的规模约 6.4 万亿元，占比 56%；第二支柱养老基金规模约 4.4 万亿元，占比 38%；第三支柱（主要来自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基金）规模仅为 7246 万亿元，占比 6%。而从国际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应该是以第二、第三支柱为主。例如美国 2021 年底第一、二、三支柱的规模分别为 2.85、22.81、16.55 万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6.76%、54.03%、39.21%。由此可见，我国在第三支柱的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空间，而金融行业尤其是商业保险公司在促进第三支柱的建设过程中，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

5.1.2 退休收入来源预期：仍主要来自政府，但不同人群有所分化

居民对退休收入来源的预期会影响其进行相应财务准备的行为，因此，了解居民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对我们确定未来养老金体系的发展重点有重要意义。此次调研中，我们对居民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进行了了解，结果如图 5.1 所示。平均来看，**受访者认为养老金收入的 39.54% 应来源于政府，是预期的第一大养老金收入来源，这与我国第一支柱规模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状吻合。**但我们知道，第一支柱养老金的替代率偏低，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为例，2020 年的收入替代率仅为 36%，远低于国际上的养老金替代率警戒线 55%。因此必须有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作为补充。平均来看，受访者认为 25.66% 的养老金收入应来自于企业，这主

05·中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

要是因为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受益面相对较小，民企没有能力也没有积极性参与，而国企有能力和积极性参与，但在职工中覆盖面很小。在第二支柱覆盖不足的情况下，第三支柱的角色就尤为重要。平均来看，受访者预期 34.80% 的养老金收入应来自于个人，这与目前仅占比 6% 的第三支柱规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充分说明在居民端对养老金融产品有很强需求，未来第三支柱的发展潜力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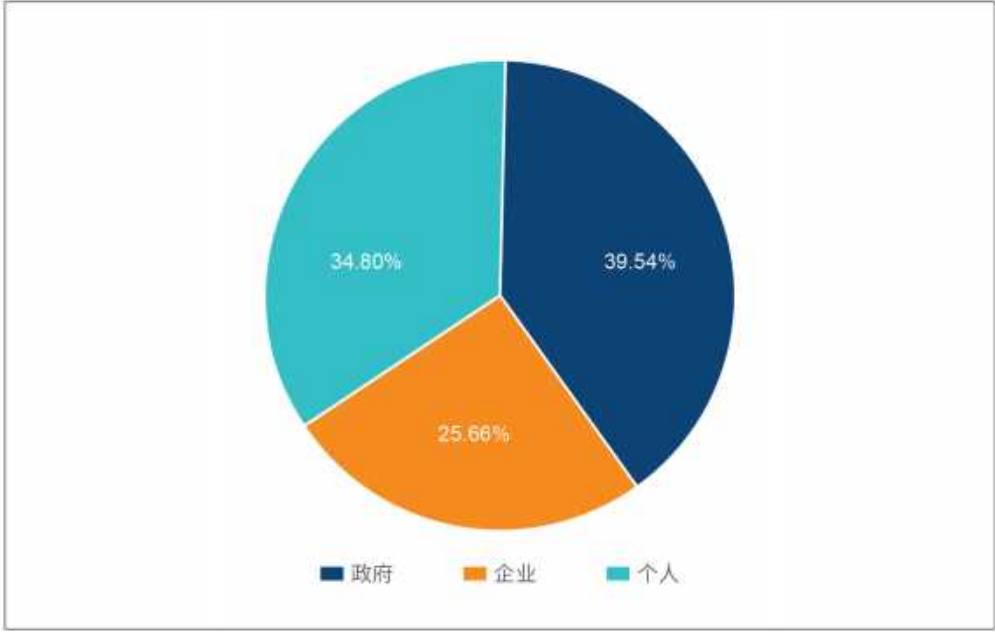


图5.1 受访者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

我们进一步对比了未退休者和已退休者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如图 5.2 所示。可以发现，两种人群对于收入来源预期有显著区别，主要集中于政府和个人的收入占比上：**未退休人群对来自个人的养老金收入的占比预期高于已退休人群。**已退休者预期来自政府的收入占比高达 43.12%，来自个人的收入占比仅 29.20%；而未退休者预期来自政府的收入占比为 39.14%，来自个人的收入占比为 35.42%。这种群体预期期间的差异与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账户面临的严峻挑战有一定关联。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的预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将在 2028 年出现赤字；而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 2019 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负值。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将在 2027 年达到峰值，并在 2035 年耗尽。相关数据和报道屡见报端，使得尚未退休的人群对自己从政府得到的退休金收入预期下降，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养老储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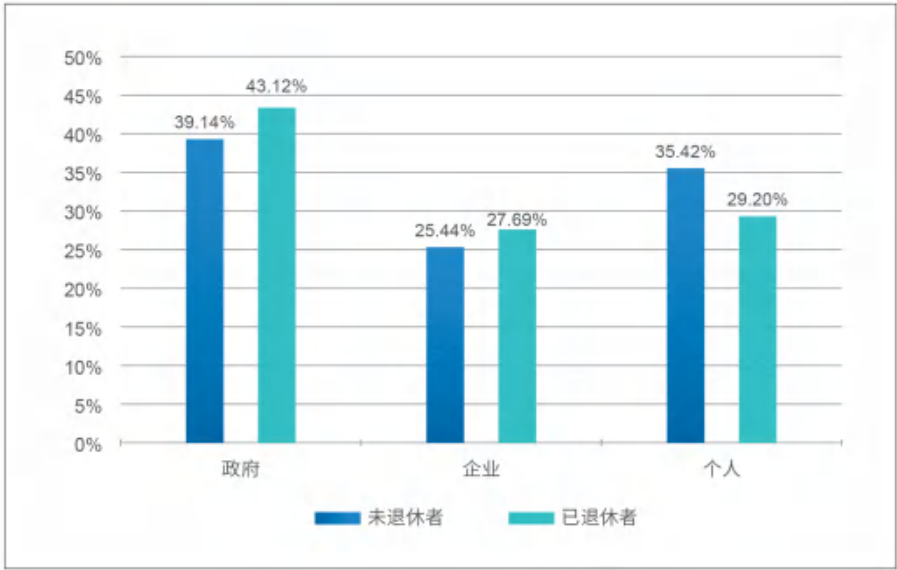


图5.2 已退休者和未退休者的预期养老金来源

不同行业从业者对养老金收入的来源预期也有所不同，如图 5.3 所示，总体上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政府部门从业者的退休收入高度依赖于政府。在政府从业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最主要的退休收入来源于政府，占比高达 49.50%，远高于其他行业从业者对政府给予的退休收入的预期。第二、作为企业年金的主要参与者，国有企业的从业者对来自企业的退休收入期望较高，受访者预期自己养老金收入的 28.49% 来源于企业，明显高于受访者总体对来自企业退休金的收入预期 25.66%。第三、受雇于私人企业、个人 / 家庭和无工作人群是对个人养老金收入依赖程度最高的群体，预期来自个人的养老金收入占比分别为 36.52%、40.10% 和 39.96%。因此这部分人群有望成为养老金融产品购买的主力军，在进行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和营销时也应该重视这部分人群的具体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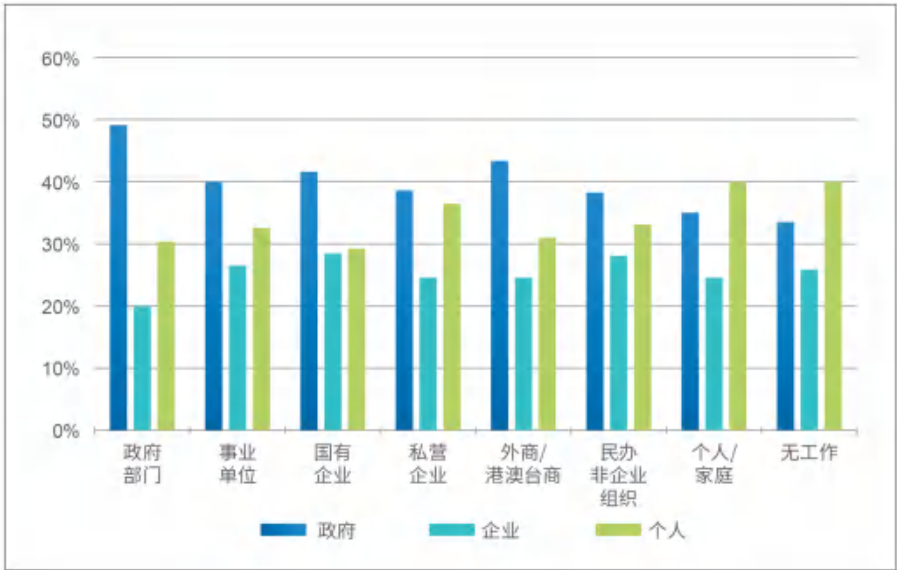


图5.3 不同受雇单位受访者预期的养老金收入来源构成

5.2 退休财务准备现状

本节将从储蓄积累方式、家庭资产配置、具体财务准备方式、财务建议信任程度四个角度分析居民退休财务准备方式现状。

5.2.1 储蓄积累方式：普遍倾向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我们首先对受访者的储蓄积累方式进行了调查。对于未退休受访者，我们的提问方式是：“你更希望以那种形式进行储蓄”？对于已退休受访者，我们的提问方式是：“你主要采用了哪种形式进行储蓄”？调查结果如图 5.4 所示。可以看到，**相对于不定额储蓄方式，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有规划的定额储蓄方式来为自己积累养老金。**在未退休受访者中，有 36.76% 的人选择了“希望每月定额储蓄”，比选择“希望每月不定额储蓄”的人多出 9 个百分点；有 20.37% 的人选择了“希望每年定额储蓄”，比选择“希望每年不定额储蓄”的人多出 7 个百分点；仅 1.90% 的人选择了“希望退休前一次性储蓄”。**但对已退休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定额储蓄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困难。**仅 29.70% 和 20.54% 的退休受访者实际采取了每月定额储蓄和每年定额储蓄的方式，而有 28.96% 和 19.31% 的退休受访者实际采取了每月不定额储蓄和每年不定额储蓄的方式。从图 5.4 中对比可知，由于缺乏财务规划，很多人无法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定额储蓄方式，最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实际采取了不定额的储蓄方式，而通过养老金融产品的“强制”储蓄特性或许可以辅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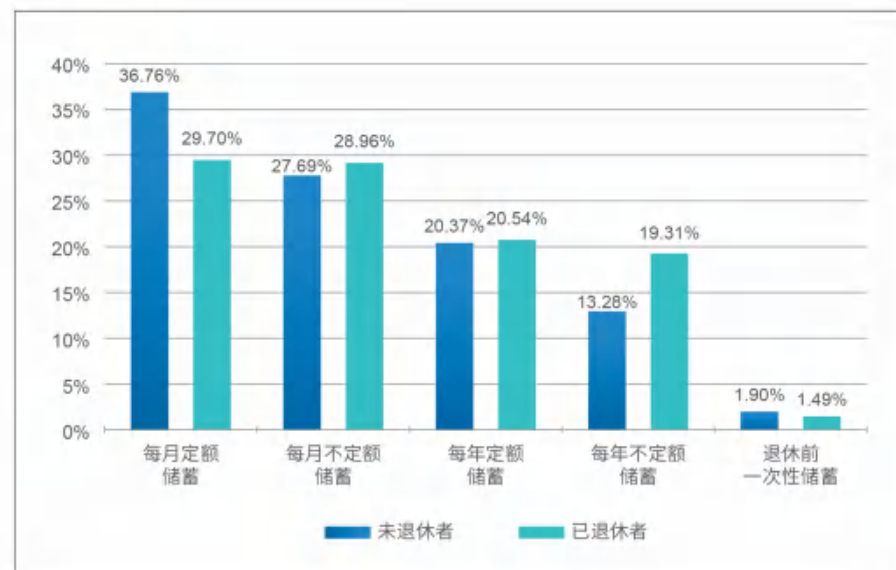


图5.4 受访者的养老储蓄积累方式

5.2.2 家庭资产配置：房产价值占比最高，风险资产和保险配置比例和家庭财富正相关

良好的家庭资产配置对居民养老保障有重要意义。通常而言在资产配置中应当实现三个方面的均衡：风险、收益和流动性。首先，从风险角度看，居民应当将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资产类别，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提供更稳定的收益，避免因单一资产的波动而造成财务困境。其次，从收益角度看，资产配置中需要加入适当的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实现资产的长期累积和增值，对冲由于通胀带来的购买力下降风险。最后，从流动性角度看，退休后可能面临各种意外性支出，如医疗费用支出等，需要保持充足的资产流动性，以满足紧急情况下的资金需求。

此次调研还对受访者的家庭资产配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全部样本的家庭平均总资产为 180.92 万元，中位数为 100.00 万元。家庭总资产的配置情况如图 5.5 所示。总体而言，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第一、**房产在家庭资产配置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受访者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 64.79%，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居民观念中对住房的重视，也是因为自商品房制度建立以来，房价的持续上涨，居民可借助杠杆作用放大收益，即资产的历史表现起了一定作用。第二、**金融资产尤其是风险资产和保险的占比较低**。图 5.5 展示了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即固定收益资产（存款、债券等）、风险资产（股票、基金等）和保险资产在居民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到，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极其不均衡，固定收益资产占比 15.74%，风险资产和保险的占比仅为 3.23% 和 3.06%。而在美国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中，风险资产和保险的占比高达 18% 和 24%。对比可知，我国居民的风险资产和保险配置比例存在不足。低风险资产配置可能与中国过去较高的无风险收益率有关。在过往高利率环境下，无风险、低风险金融资产已经能够满足居民的收益率要求，因此承担风险的意愿不足。而低保险资产配置可能是与居民普遍较低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感知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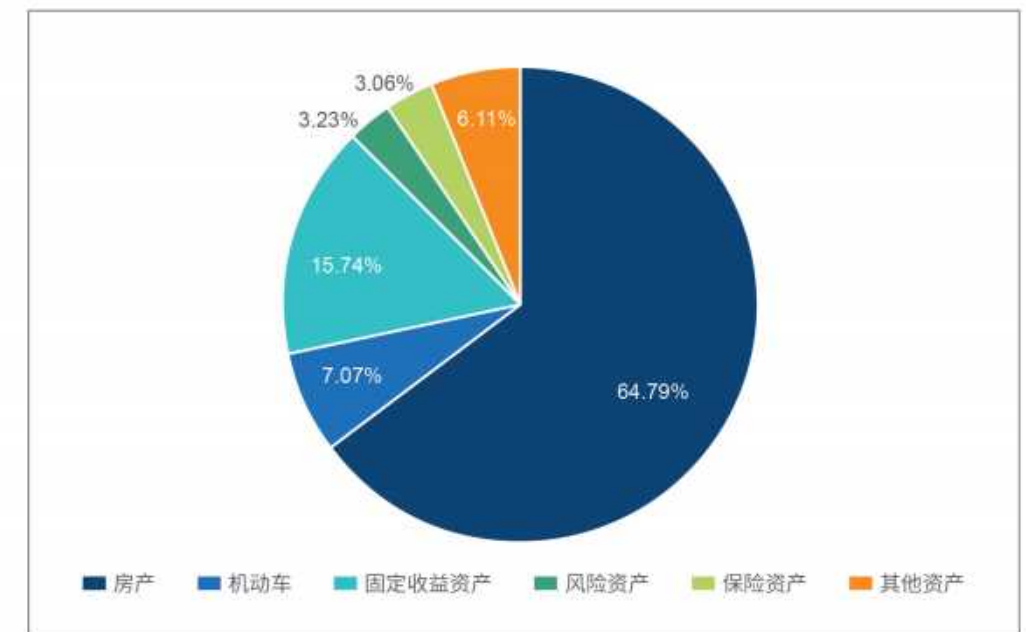


图5.5 受访者的家庭资产配置比例

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资产和保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和家庭财富状况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将全部样本按照家庭年收入的高低等分成十组，并计算出各组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和保险占总金融资产比例的中位数，结果如图 5.6 所示。整体上看，风险资产和保险的配置都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即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更为多元化。在年收入最高的家庭中，风险资产的配置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14.29%，保险的配置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7.69%，而在年收入最低的家庭中，风险资产和保险的配置均为 0。此外我们还发现，第 4 组家庭就已经开始配置保险产品，第 6 组家庭才开始配置风险资产，说明相比风险资产，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配置保险的意愿更强。这说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而言，具备一定的财务规划实力和长期储蓄需求；但相比高收入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又较低，因此保险产品这种具备尾部风险对冲功能的长期储蓄型产品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将全部样本按照家庭总资产高低等分成十组，结果如图 5.7 所示。可以看出，图 5.6 和图 5.7 所反映的趋势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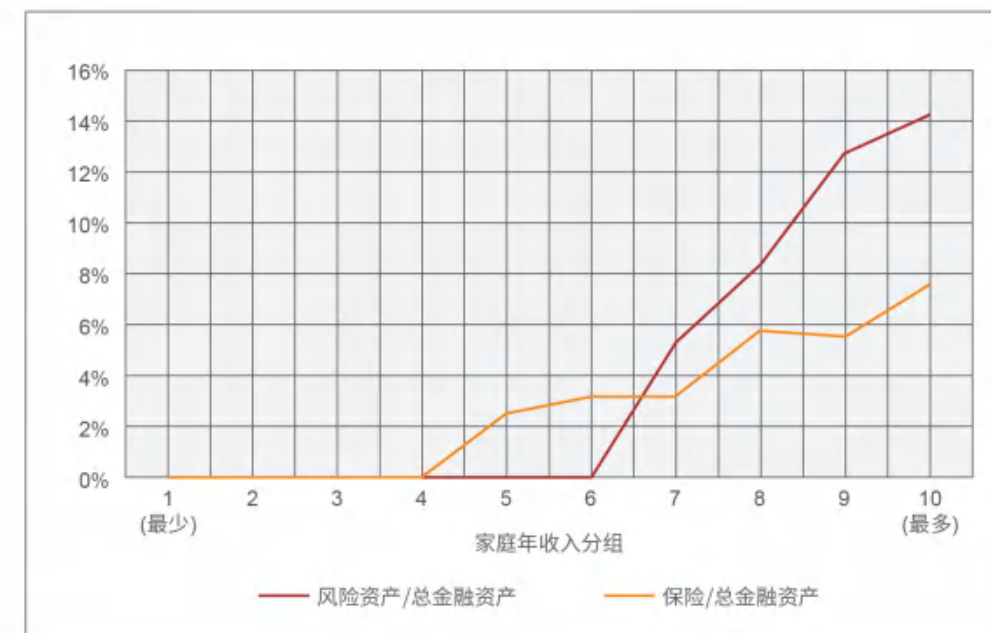


图5.6 家庭年收入与风险资产和保险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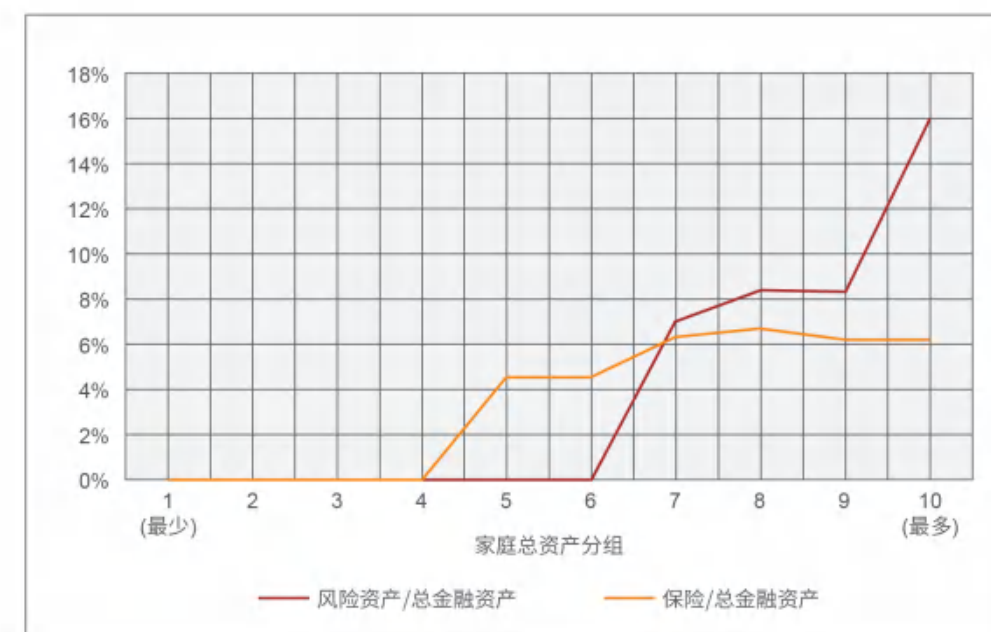


图5.7 家庭总资产与风险资产和保险配置

5.2.3 商业保险覆盖率较低，寿险在商业保险中更受人们偏好

我们对受访者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图 5.8 所示。**社保、银行理财和个人养老金账户是覆盖率最高的三种退休财务准备方式**；90% 以上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将股票、基金、信托等投资属性的金融产品作为退休财务准备方式。此外，在未退休受访者中有 29.78% 的人购买了商业保险，在已退休受访者中有 27.23% 的人购买了商业保险，可见我国居民的保险覆盖率仍然较低，尚有超过 2/3 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保障，这部分市场空间有待保险公司进一步挖掘。

我们希望进一步研究受访者对各种不同的商业保险产品的购买情况。图 5.9 展示了我们的调查结果，**无论是在已退休人群还是未退休人群中，寿险都是最受欢迎的保险品种**，在购买过商业保险的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购买过寿险。其次受欢迎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险，有 37.12% 的未退休者和 29.09% 的已退休者购买过商业养老保险，有 36.29% 的未退休者和 21.82% 的已退休者购买过健康 / 医疗 / 重疾险。而投资连结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非主流保险品种，投保人对它们的了解较少，购买比例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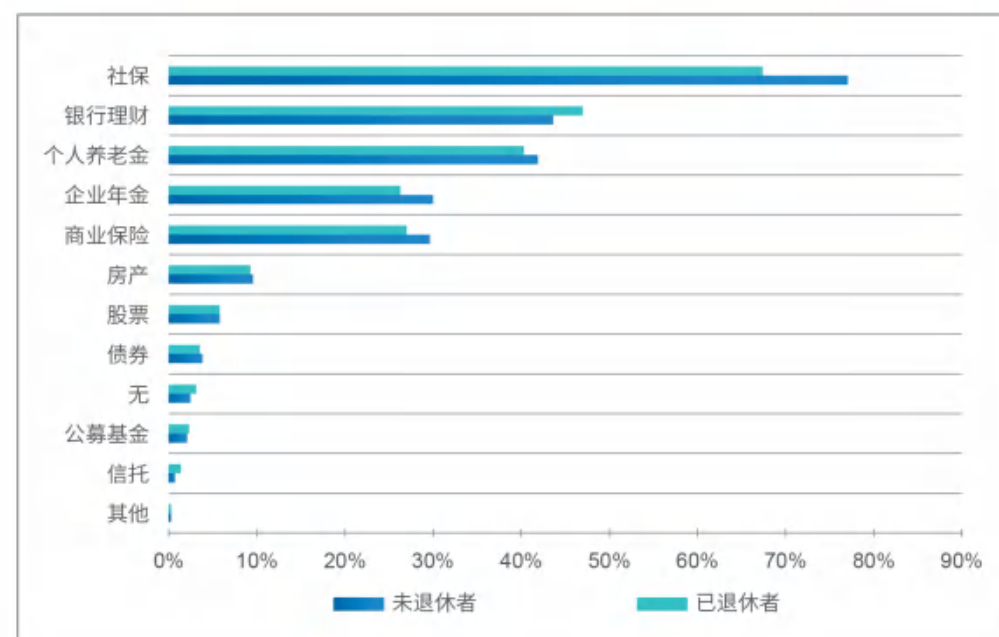


图5.8 受访者的退休财务准备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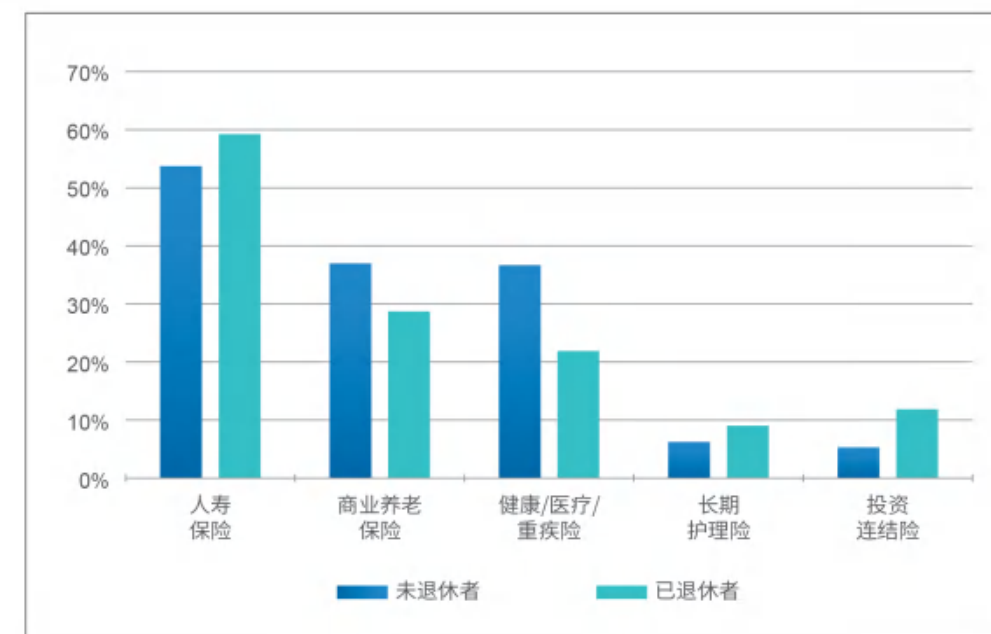


图5.9 购买商业保险的受访者对具体品种的选择

5.2.4 对财务建议的信任：人们更愿意相信政府和亲属的建议，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越高的人群，商业保险覆盖率也越高

我们首先询问了受访者是否认同这一说法：“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调查结果如图 5.10 所示，受访者给出的社会信任程度的均值为 6.51，绝大多数（73.00%）受访者给出的分数在 5-8 分之间，说明整体而言居民对社会关系的信任程度还是较高的。进一步，我们询问受访者：“在为退休进行财务准备时，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来自以下机构或群体的建议”？结果如图 5.11 所示。**整体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政府和亲属的建议**，平均信任分数分别为 7.12 和 7.33，分别有 79.31% 和 82.21% 的受访者给出了 6 以上的信任分数。而人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最低，仅不到 30% 的受访者给出 6 分以上的信任分数，平均信任分数为 4.30。对于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理财网站、理财规划师等机构和顾问的财务建议，受访者的信任程度比较中性，多数受访者给出的信任分数在 4-6 分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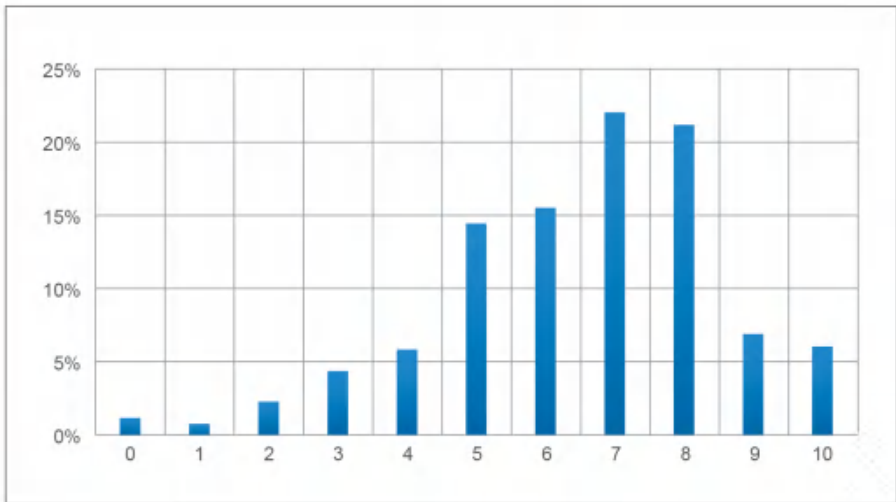


图5.10 受访者的社会信任程度

信任程度	政府 / 公共部门	企业 / 雇主	理财网站 / app
0	0.94%	1.58%	5.89%
1	0.57%	1.24%	3.39%
2	1.21%	3.32%	7.25%
3	2.87%	5.52%	11.56%
4	3.93%	8.04%	11.65%
5	11.16%	18.56%	20.00%
6	12.97%	19.15%	15.24%
7	17.47%	19.87%	11.78%
8	23.43%	14.15%	8.86%
9	13.41%	5.02%	2.45%
10	12.03%	3.54%	1.93%
平均值	7.12	5.97	4.85

信任程度	银行 / 理财机构顾问	保险公司 / 代理人	理财规划师
0	3.49%	5.42%	5.22%
1	2.55%	4.36%	2.87%
2	5.05%	7.97%	6.21%
3	8.64%	10.76%	8.98%
4	9.63%	12.62%	9.40%
5	19.13%	20.09%	18.31%
6	16.23%	15.54%	15.61%
7	16.23%	12.08%	14.75%
8	11.68%	7.15%	12.15%
9	4.55%	2.45%	4.48%
10	2.82%	1.56%	2.00%
平均值	5.46	4.76	5.26

信任程度	媒体	配偶 / 子女 / 兄弟姐妹	朋友 / 同事
0	7.84%	0.59%	2.43%
1	5.30%	0.57%	2.13%
2	9.68%	1.14%	3.41%
3	13.46%	2.33%	6.51%
4	12.67%	3.29%	8.07%
5	21.06%	9.87%	20.27%
6	12.84%	12.13%	18.68%
7	9.06%	17.15%	18.58%
8	5.32%	23.21%	14.01%
9	2.03%	14.82%	4.36%
10	0.74%	14.90%	1.56%
平均值	4.30	7.33	5.71

图 5.11 受访者对各方财务建议的信任程度

保险产品是一种“或有求偿权”（Contingent Claim），投保人购买的保单本质上是保险人对未来某一风险事件发生后的赔偿承诺。因此只有投保人对保险人足够信任，才会愿意购买商业保险。我们将全部受访者按照对保险公司 / 代理人的信任程度等分成 10 组，分别统计各组内不同商业保险的覆盖率，结果如图 5.12 所示。**总体上看，对保险人越信任的居民购买保险的意愿越强，对保险公司 / 代理人的信任程度与商业保险覆盖率正相关。**因此，从保险公司和保险代理人的角度看，需要增强自身品牌建设，在与客户的互动中建立起客户信任感，才能更好地挖掘客户对保险的需求，打开潜在的保险市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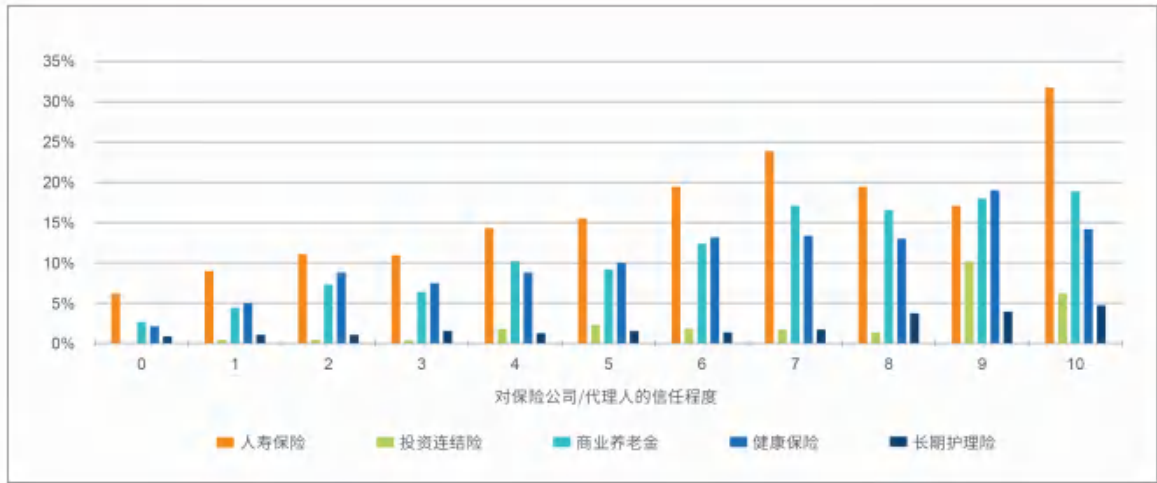


图 5.12 对保险公司 / 代理人的信任程度与商业保险覆盖率

5.3 退休财务准备需求

前两节我们对居民的退休储蓄来源和财务准备方式进行了分析，本节将聚焦于居民的退休财务准备需求，包括养老金融产品需求、附加服务需求和对企业提供的退休服务需求等，这些需求对养老产品设计和提供服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5.3.1 养老金融产品需求：最关注本金安全、流动性和账户透明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低，流动性偏好高。如图 5.13 所示，受访者认为本金安全应该是养老金融产品最重要的属性，45.73% 的受访者给本金安全的重要性打出了 10 分，全体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数为 8.68 分。有 32.57% 的受访者给“有需要时能将养老金及时、便捷地提取出来，满足流动性需求”的重要性也打出了 10 分，平均重要性得分为 8.32 分。此外，由于担心可能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受访者普遍希望养老金账户的投资信息应公开透明，40.86% 的受访者给出了 10 分的重要性评分，平均重要性得分为 8.51 分。另外，有了养老金并不代表能购买到优质养老服务，受访者给养老金融产品附加养老相关服务给出的重要性得分平均为 8.1 分。因此整，合养老产业链，提供“养老金+康养服务”产品是养老金融产品提供方应关注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投资收益，受访者的期望并不高，平均重要性得分仅为 7.66，仅有 20.66% 的受访者给“能够获得超过通胀的投资收益”打出了 10 分的重要性评分。

结合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构想出最受居民欢迎的金养老金融产品形式：**投资于高流动性、低风险的货币基金或短期债券，投资账户信息公开透明，同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养老相关服务。**

重要性	本金安全	投资收益	流动性	公开透明	附加服务	财富传承
1	0.32%	0.54%	0.20%	0.37%	0.47%	1.34%
2	0.15%	0.45%	0.10%	0.17%	0.20%	1.09%
3	0.77%	1.68%	0.69%	0.57%	0.84%	2.40%
4	1.16%	2.10%	1.71%	1.04%	1.56%	3.54%
5	3.49%	8.44%	3.98%	4.31%	4.73%	11.14%
6	4.97%	11.51%	6.56%	5.82%	8.98%	13.56%
7	9.13%	17.10%	13.34%	11.28%	16.11%	15.52%
8	16.73%	23.95%	23.76%	19.40%	22.77%	19.87%
9	17.55%	13.56%	17.10%	16.18%	15.94%	11.28%
10	45.73%	20.66%	32.57%	40.86%	28.41%	20.27%
平均值	8.68	7.66	8.32	8.51	8.10	7.34

图 5.13 受访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偏好



5.3.2 金融产品附加服务：财务规划咨询服务最受欢迎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在退休财务规划方面，您认为以下哪些服务会成为您选择一家机构养老金融产品的主要考虑因素？”，统计结果如图 5.14 所示。选择“帮助制定退休财务规划，并长期提供理财咨询”和“提供一套系统、科学的养老管理服务方案”的受访者超过一半。这说明，除了购买金融产品外，**人们更希望从专业机构获得全面、专业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而在产品日趋同质化的当下，提供差异化的养老顾问服务将会成为养老金融行业的新的竞争热点。而只有 15.32% 的受访者选择了“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教育培训”，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并不情愿花时间主动去学习金融理财的相关知识，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咨询顾问来替自己做出理财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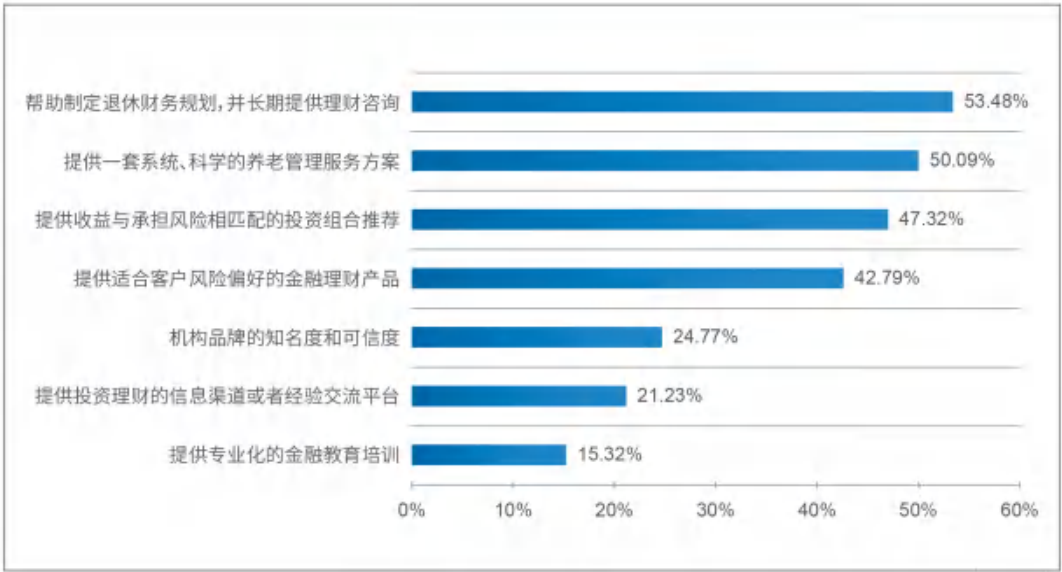


图5.14 受访者对产品附加服务的需求

5.3.3 企业退休服务：人们最希望企业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除了政府和居民自身外，企业也是居民退休保障的重要力量。作为雇主，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员工提供和退休相关的服务。我们向受访者调查了“在退休准备方面，您最希望自身所在的企业为您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得到的结果如图 5.15 所示。**超过 60% 的受访者希望雇主能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远超其他方面的需求**。由此可见，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程度的加深，以及退休收入替代率较低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居民希望适当延迟自己的退休年龄，在老年时仍然能获得一定的工作收入来改善生活状态。其次，有 40.86% 的受访者选择了“提供定期体检以及退休后的医疗保健服务”，说明人们不仅在意退休收入水平，还非常重视退休后获得的养老保健服务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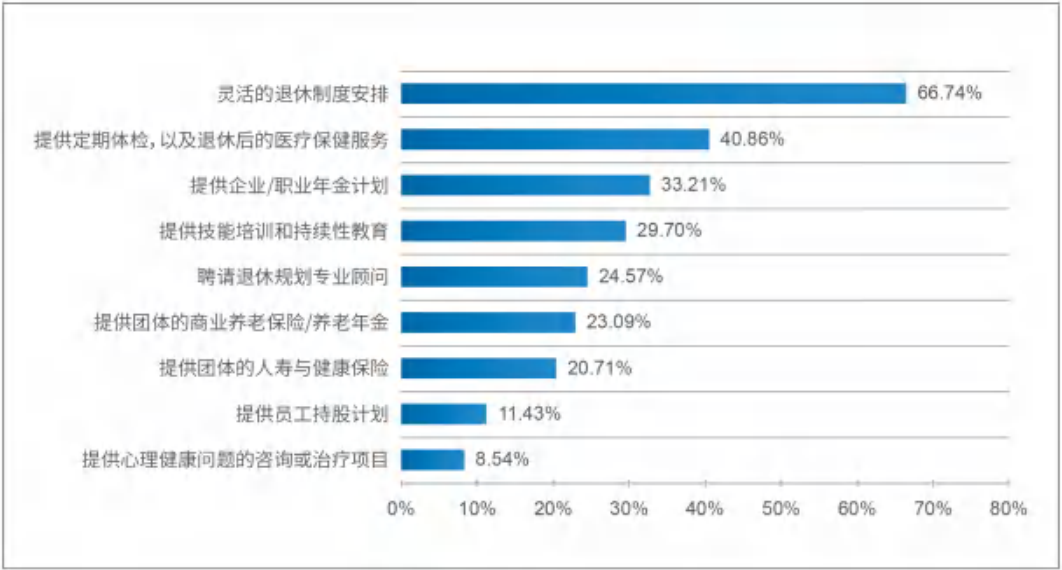


图5.15 受访者对企业退休服务的需求



06·专题研究

06. 专题研究

6.1 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风险感知与退休准备

6.1.1 客观金融素养明显提升，主观上存在金融素养不自信现象

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是指个体能够高效合理地管理和处理其所拥有的私人金融资产和金融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也是个体对各金融领域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本次调研中，我们使用 Lusardi 和 Mitchell 于 2004 年设计的三个选择题（通称“三大问题”）来衡量受访者对于复利计算、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个方面的金融知识。“三大问题”的具体内容与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受访者对金融素养三大问题的回答情况

题目与选项		2022 年	2023 年
题 1 【复利计算】假如您的储蓄账户中存有 1000 元人民币，储蓄利率为每年 2%，若您将这笔钱放在账户中不做变动，您认为 5 年后您的账户中将有多少人民币？			
A.	多于 1020 元人民币（正确）	72.88%	80.82%
B.	正好 1020 元人民币	7.13%	5.91%
C.	少于 1020 元人民币	7.90%	6.68%
D.	我不知道	7.87%	5.57%
E.	拒绝回答	4.22%	1.01%
题 2 【通货膨胀】假如您的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 1%，年通货膨胀率为 2%。1 年后您在账户中将拥有多少储蓄可用于消费？			
A.	比今天的储蓄多	14.21%	14.35%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7.85%	5.54%
C.	比今天的储蓄少（正确）	61.10%	68.35%
D.	我不知道	12.79%	10.47%
E.	拒绝回答	4.05%	1.29%
题 3 【风险分散】您认为以下的表述是否正确？“购买单支股票获得的回报比购买多支更稳定。”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18.58%	13.19%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正确）	42.95%	65.48%
C.	不知道	33.58%	20.09%
D.	拒绝回答	4.89%	1.24%

结果显示，本次调研中受访者回答“三大问题”正确率分别为 80.82%、68.35% 和 65.48%，相比于 2022 年均有较大提升。我们以受访者答对的题目数量作为衡量个体客观金融素养水平的标准，如图 6.1 所示，受访者金融素养水平呈现向上阶梯状分布。具体而言，全体受访者平均答对 2.14 道问题，答对三道问题的受访者占比最大（44.35%），答对两道问题的受访者占比次之（31.90%）。**总体上看，我国居民金融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具备较高水平金融知识的居民比例达到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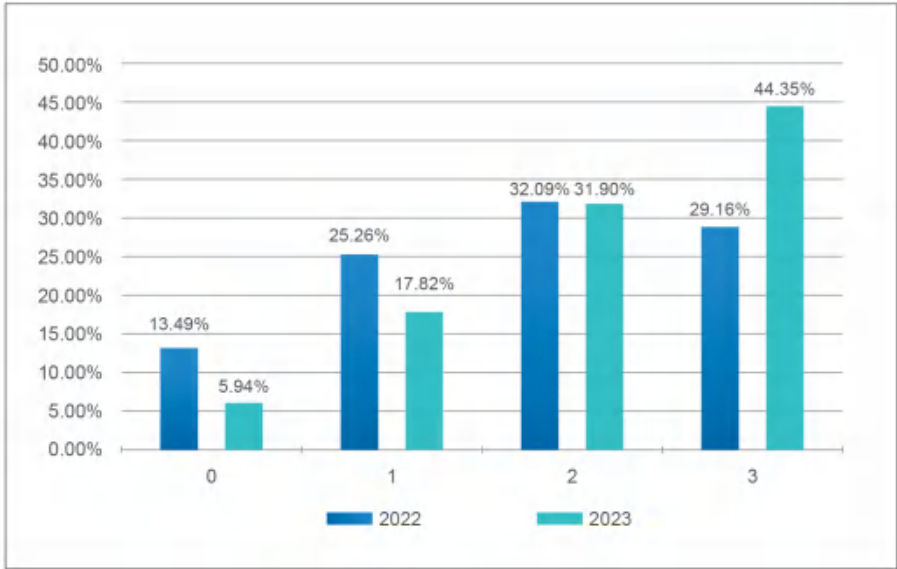


图6.1 受访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分布

进一步地，我们探究了影响受访者客观金融素养的因素。我们将受访者的客观金融素养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自变量包括如下几个与个体特征相关的指标：年龄、性别（是否为女性）、退休状态（是否退休）、工作部门（是否为体制内工作单位）、自评身体健康水平、自评心理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是否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婚姻状况（目前是否已婚）、生育状况（是否育有子女）、个人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资产水平、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受访者收入与资产水平均在 1% 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回归结果见表 6.2 中第 1 列。结果显示，在添加了上述个体特征变量后，**个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对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与我们的常识相符，即收入较高的个体通常有较高的理财需求，需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而受教育水平高的个体文化素养更高，有更多机会接触相关常识，有更强的能力提升金融素养。**而在政府、国企和其他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的受访者金融素养相对更低**，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收入和学历等因素的影响后依然显著，可能说明：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保障相对健全的机构，员工福利待遇较为丰富稳定、退休准备比较充分，进而没有更多意愿参与金融市场，导致客观金融素养相对较低。在性别方面，我们发现男性的金融素养比女性高。除此之外，年龄、退休状态、自评身体或心理健康水平、婚姻与生育状况、家庭收入等对客观金融素养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表 6.2 受访者个体特征对金融素养、过度自信与风险认知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金融素养水平	(2) 过度自信水平	(3) 风险认知水平	(4) 风险认知水平
年龄	-0.001 (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性别	-0.179*** (0.029)	-0.088*** (0.019)	0.100*** (0.038)	0.131*** (0.038)
退休状态	-0.035 (0.052)	0.005 (0.033)	0.079 (0.067)	0.086 (0.067)
工作部门	-0.103*** (0.030)	-0.001 (0.019)	0.065* (0.039)	0.085** (0.039)
自评身体健康	-0.017 (0.022)	-0.007 (0.014)	0.078*** (0.028)	0.081*** (0.028)
自评心理健康	0.012 (0.020)	0.000 (0.013)	0.037 (0.025)	0.035 (0.025)
受教育水平	0.367*** (0.036)	0.065*** (0.024)	0.187*** (0.047)	0.117** (0.047)
婚姻状况	0.037 (0.052)	0.021 (0.033)	0.033 (0.067)	0.026 (0.066)
生育状况	-0.036 (0.056)	-0.038 (0.036)	0.011 (0.072)	0.018 (0.071)
个人收入水平	0.013*** (0.004)	0.009*** (0.002)	0.009* (0.005)	0.006 (0.005)
家庭收入水平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2)
家庭资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金融资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风险偏好			0.023*** (0.008)	0.022*** (0.008)
时间偏好			0.017** (0.008)	0.015* (0.008)
金融素养水平		-0.659*** (0.010)		0.182*** (0.029)
过度自信水平				-0.020 (0.032)
常数项	1.980*** (0.097)	1.175*** (0.065)	0.549*** (0.133)	0.202 (0.142)
观测值	4,041	4,041	4,041	4,041
调整后 R 方	0.0884	0.522	0.0283	0.0500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中数值为对应系数的标准误。

在受访者回答了关于金融素养的“三大问题”后，我们紧接着询问了受访者对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的看法：

请给下面每一种结果一个您认为的可能的百分率（填入的百分率数字加总等于 100）。

- (1) 三个问题都答对的概率：_____ %
- (2) 只答对两个问题的概率：_____ %
- (3) 只答对一个问题的概率：_____ %
- (4) 三个问题都不对的概率：_____ %

我们利用受访者给出的概率分布计算出受访者对自己回答正确的题目的预期数，并将受访者实际回答正确的题目数与之对比。如果预期正确题目数高于实际正确题目数，则说明受访者存在过度自信现象；否则，受访者存在低估自身金融素养的现象。

与客观金融素养分布呈阶梯状不同，受访者主观金融素养的平均值为 2.03，中位数为 2，主观估算在 1.2-1.5、1.8-2.1、2.7-3.0 分段人数最多；但在 2.1-2.7 分段人数相对较少，且估算在 2.7-3.0 分段的受访者占比约 20%，但实际上有约 45% 的受访者的客观金融素养得分为 3，**表明受访者存在低估自身金融素养的情况**。这一结果与往年调研得到的结论有所不同。在 2022 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居民的金融素养客观上存在不足，且存在过度自信现象。而今年，受访者表现出金融素养水平明显提升，部分高素养群体在对自身答题正确率进行评估时可能较为保守，导致出现受访者总体低估金融素养的情况。

我们用受访者的主观金融素养减去客观金融素养来表示其过度自信水平。如图 6.2，受访者过度自信水平的总体分布呈现对称的单峰形式，均值为 -0.12，证实了受访者总体低估自身金融素养的推测。进一步地，我们检验影响居民金融素养过度自信水平的因素。我们以这一差值作为因变量，对受访者的客观金融素养水平和其余个体特征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2 中第 2 列所示。**个体客观金融素养水平与其过度自信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金融素养越高的受访者更容易表现出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不自信。个人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对过度自信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高收入、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个体对自身金融素养表现出更强的过度自信**。此外，男性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水平显著地高于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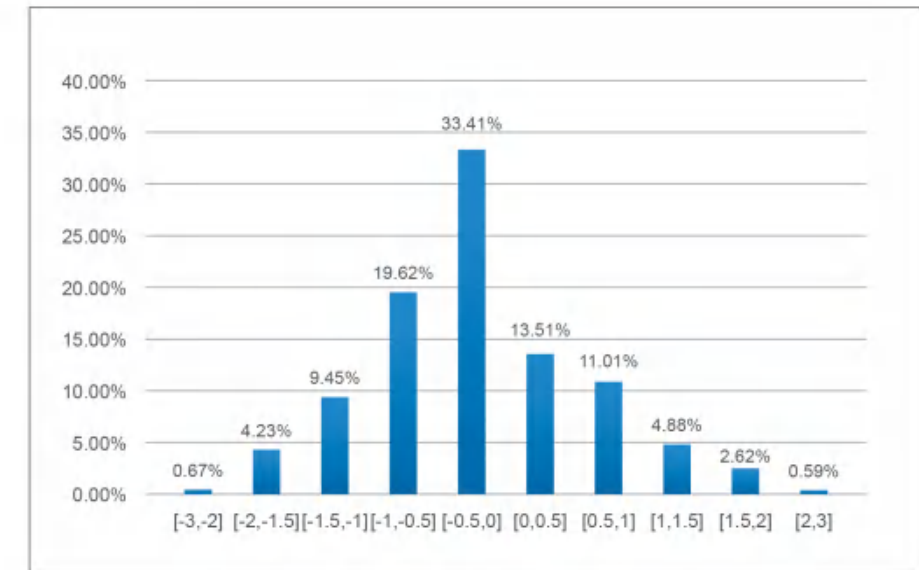


图6.2 受访者客观金融素养与主观金融素养差值分布

6.1.2 居民对老龄风险的客观认识不足，但主观感知水平较高

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某些特定风险及其后果的主观认识。我国居民在退休后面临健康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早逝风险等多重风险因素，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偏差将导致退休准备不充分。如果低估了自身未来的生存概率，个体将会暴露在较大的长寿风险下；对风险的认知不足还会导致养老准备不充分、养老金配置意愿下降等多种问题。因此，基于本年的调研结果，我们研究了受访者可能存在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对人均寿命等事关养老决策的指标的认识，以及上述因素对受访者退休准备意愿、老龄风险关注程度的影响。

我们根据 Armin Falk 等（2022）和 Thomas Dohmen 等（2011）提出的方法，以受访者自我评估的方式来测量他们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我们询问了受访者以下问题：请在 0-10 中选择，其中 0 表示“完全不愿意承受任何风险”或者“完全不愿意放弃今天利益”，10 表示“很愿意承受风险”或者“完全愿意放弃今天利益”。

(1) 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受风险？

(2) 与他人相比，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愿意放弃今天利益来换取未来更大利益的人？

问卷回答结果显示，受访者主观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的均值分别为 5.10 和 6.12，且大部分在 5-8 之间。相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总体时间偏好分布更加集中，反映出受访者整体上具有一定的长远考虑意识，且对于未来有比较乐观的预期。我们将受访者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作为解释变量，用于之后的回归分析。

形成对退休准备的积极态度和对未来风险的正确认识，需要人们对老龄人口收入、健康状况等客观事实有基本了解。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于一些客观指标的认识，以衡量他们对老龄风险的客观认知水平。这些指标均以我国 2022 年为基准，包括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人口平均寿命、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和城镇退休人口月平均养老金等四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如表 6.3 所示。

表 6.3 受访者对老龄风险认知的四个问题的回答情况

题目与选项		选择比例
题 1 2022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大致为多少？		
A.	6% 以下	0.87%
B.	6%-12%	8.49%
C.	12%-18% (正确)	27.59%
D.	18% 以上	26.70%
E.	不清楚	36.35%
题 2 2022 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大致为多少？		
A.	65-68 岁	7.77%
B.	70-73 岁	19.52%
C.	75-78 岁 (正确)	42.39%
D.	80-83 岁	7.77%
E.	不清楚	22.54%
题 3 2022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慢性病发病率大致为多少？		
A.	40% 以下	7.70%
B.	40%-60%	29.30%
C.	60%-80% (正确)	20.39%
D.	80% 以上	5.22%
E.	不清楚	37.39%
题 4 2022 年中国城镇退休人口平均每月养老金大致为多少元？		
A	2000 元以下	15.32%
B	2000 元 -4000 元 (正确)	49.25%
C	4000 元 -6000 元	11.11%
D	6000 元以上	0.89%
E	不清楚	23.43%

表 6.3 表明，我国居民对退休后存在的老龄风险客观上认知不足。虽然受访者对于人均寿命和城镇退休人口月平均养老金的估计相对准确，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对这两个指标不清楚，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余寿和退休后收入出现错误估计。在老年人口比例上，有高达 36% 的受访者不清楚这一比例。在做出选择的受访者中，42% 高估了这一比例，12.5% 低估了老年人口数量；总体反应出这部分受访者高估了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对于慢性病发病率的估计最为不乐观，37% 的受访者不清楚这一指标；在做出选择的受访者中，近 60% 的受访者低估了发病率；反映出我国居民对慢性病风险缺乏认知，进而对慢性病带来的生活质量下降、医药开支增加缺乏客观准确评价。

为了反映受访者对这些客观事实的了解程度，我们用受访者回答这四个问题的正确数目来衡量其客观风险认识水平。受访者平均只答对了 1.4 个问题，进一步反映出受访者对老龄风险的认知水平较低。我们将客观风险认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受访者的个体特征、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客观金融素养水平以及对自身金融素养的过度自信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2 中第 3、4 列所示。发现：女性、在体制内单位工作、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客观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客观风险认知水平显著更高。值得关注的是，自评身体健康水平较好、风险偏好与时间偏好较强的受访者，他们表现出的风险认知水平也显著较高，其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风险认知能力较强的受访者可能更加注重健康风险的预防，因此自评健康水平较高；风险认知能力较强的受访者也可能更加注重风险的分散与预防，在更大程度上愿意承担风险或者放弃今天的利益来平滑未来收入与消费。

进一步地，我们考察了受访者主观上对老龄风险的感知。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如下 4 个关于老龄风险的问题，以测评其主观风险感知水平：您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以下描述？请选择“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保持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1) 风险关注：对老龄风险的高度关注，我和我的家人为应对风险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受到风险影响的概率非常低。

(2) 风险预防：由于具有良好的财务和健康水平，我认为我和家人受到影响的概率非常低，因此没有必要为应对风险做过多的准备。

(3) 焦虑风险：我有些焦虑和担忧老龄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

(4) 恐惧风险：我非常恐惧和害怕老龄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

由图 6.3 不难看出，受访者整体对老龄风险的感知比较强烈。受访者对受到老龄风险影响的主观评价分布呈现近似对称的单峰分布，反映出居民对于受影响的概率高低的估计比较中性，整体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意见。即便如此，仍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自身和家庭还需要对老龄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备；过半的受访者对于自身焦虑老龄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比较同意；但也在相对较低程度上恐惧老龄风险的后果。综上，我们发现尽管受访者对老龄风险客观认知存在不足，对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等知识有待进一步学习，但对老龄风险的主观认知较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感知到老龄风险。

6.2 中国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

据 2022 年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消息，2022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 77.93 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前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居民健康程度显著提升，但相应退休年龄政策并没有明显变动，且法定退休年龄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现行退休政策可追溯至 1951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 60 周岁、女工人与女职员年满 50 周岁，即可获得退休养老、领取补助的资格。1978 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特殊人群、特殊工种下的退休年龄做出修改，但仍基本沿用了 1951 年条例中的“60 岁-50 岁框架”。此后，尽管养老政策模式多次调整，但一直未对退休年龄做进一步修改。面对居民收入、人均寿命不断增长，生育率下降、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的国情，适时调整退休年龄政策对促进就业、填补养老金缺口、提升人民幸福水平、推动国家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延长退休年龄已提上政策日程，2022 年 3 月印发的“十四五”规划、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2022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 年 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均有“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一表述，即通过每年延迟数月的方式，利用 10-20 年逐渐延迟到新的目标退休年龄。地方层面，山东省和江苏省均在 2022 年开启试点工作，但山东省的政策只适用于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工作的高级专家，江苏省的试点近期因“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压力”已暂缓执行。

虽然国家层面政策尚未出台，但民众仍对于延迟退休问题相当关注。为了探讨政策变动的影响，本次调研中，我们提了 3 种可能的延迟退休政策，了解受访者对政策的支持态度和退休储蓄行为的变动情况。三种政策分别为：

- (1) 渐进：渐进延长退休与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至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
- (2) 平衡：保持退休年龄和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不变（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待遇水平（以维持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
- (3) 弹性：延迟退休年龄至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同时实施弹性退休制度，个人可以选择将实际退休和社保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提前（比如男性 62 岁）或者延后（比如男性 68 岁），待遇水平依据实际退休年龄而调整。

6.2.1 居民对三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弹性制度呼声最高

总体而言，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持保留态度，持中立意见的人数最多，反对延迟退休的受访者也占有相当比例。分政策内容来看，支持弹性退休制度的呼声最高，约 70% 的受访者明确不反对这一政策；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获得的支持率最低，仅获得约 20% 受访者支持，并且有近半数受访者持反对态度；平衡式延迟退休政策虽然反对率同渐进式类似，但持有“完全不支持”态度的受访者比例相较于渐进式减少了 5.5 个百分点，可能反应了相对于退休后的待遇，受访者更注重退休的时点选择。对比 2022 年数据，本次调查中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比例降至 30%-35%，下降幅度约为 10%。这部分下降大多转移至了对前两种退休政策“完全不支持”和“比较不支持”中，侧面反映出受访者对退休政策的关注了解程度上升，自身的偏好更加明朗。

在延迟退休的条件下，大部分受访者选择增加储蓄或维持现状，且选择不同储蓄率水平的人群比例并没有随着政策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延迟退休本身就可以通过工资等手段实现养老准备，在延迟退休和增加储蓄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情况下，大部分受访者仍未降低储蓄水平，反应了居民总体对于退休准备的认识有所增强，进行退休准备的责任感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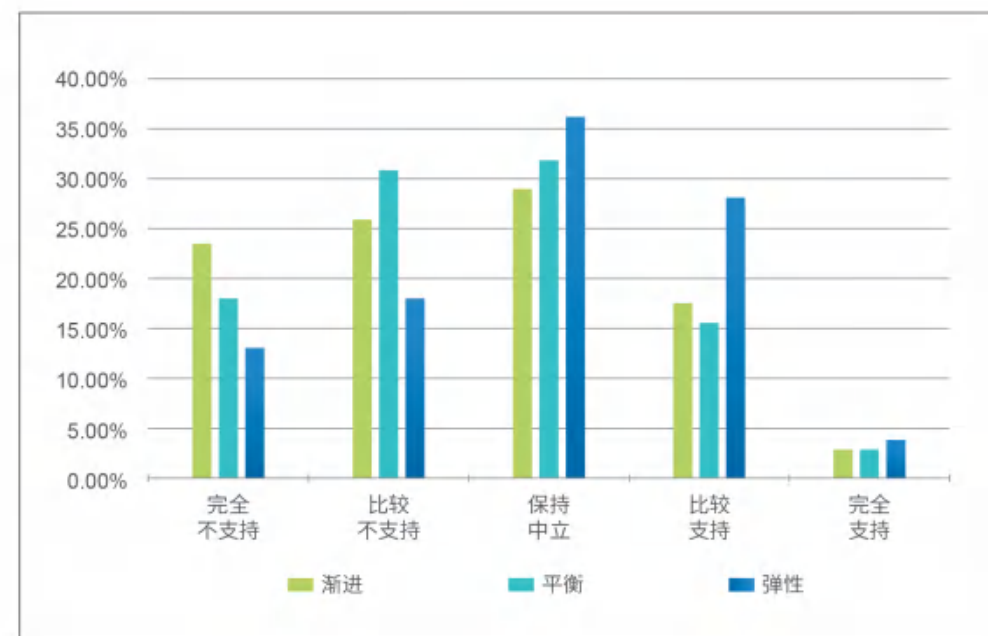


图6.4 受访者对三种延迟退休政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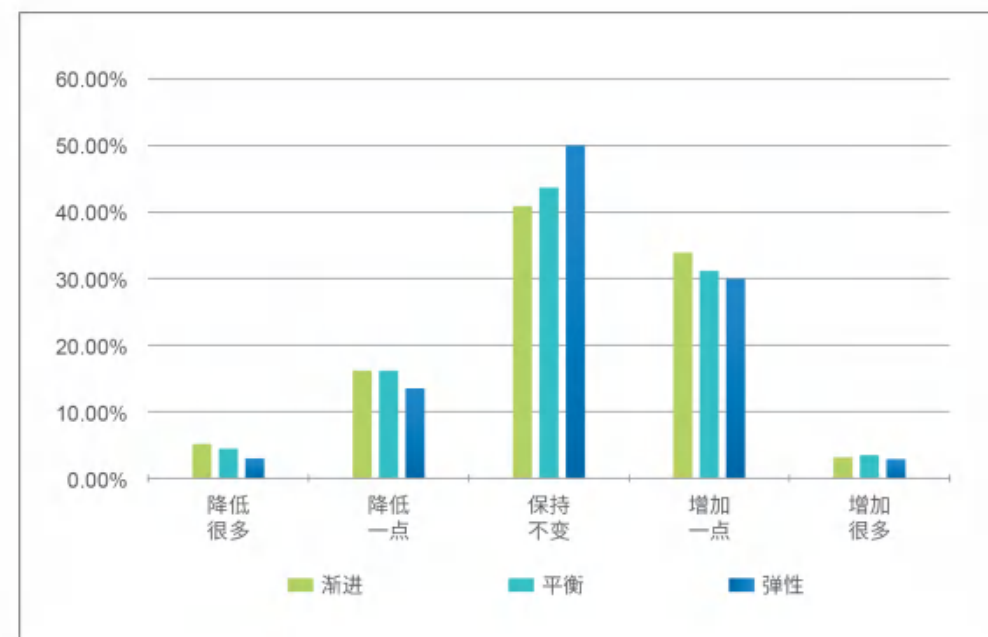


图6.5 受访者在三种延迟退休政策下的储蓄率变化

6.2.2 多重因素影响居民对退休时点的选择

在有关弹性延迟退休政策的问题中，我们进一步询问了受访者对理想退休时点的选择。我们发现，尽管居民健康程度和平均寿命有所上升，但**居民延长工作年限的意愿并没有随之上升**。在男性 65 岁、女性 60 岁退休的标准下，有 50.2% 的受访者选择提前退休，34.2% 的受访者选择按时退休，仅有 10.2% 的受访者倾向于延后退休；且**越倾向于提前退休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程度越低**。

为了研究影响退休时点选择偏好的因素，我们以受访者年龄、性别、个人收入、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风险偏好、自评心理健康程度等指标作为自变量，以是否选择提前退休这一哑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育子女的数量同选择提前退休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性，并且**生育男孩比生育女孩更有可能延迟退休**。生育子女的数量，尤其是男孩的数量越多，个人会面临较大的抚养压力，因而可能选择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以保证退休前收入的充足。这一发现表明，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二孩”、“三孩”家庭中正在工作的父母很有可能在将来会主动延长工作年限，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支持率会随生育率提高而改善。

在个人主观评价方面，**主观风险承受能力强、时间偏好更强，以及自评心理健康状况好的受访者更倾向正常或延迟退休**。相对而言，较为乐观的个体对自身未来寿命和健康程度有更高的预期，因而会选择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以获得更多收入，从而冲抵个人面临的长寿风险。风险承受能力和自评心理良好的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能力的评价更高，对未来的信心更强，进而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延迟退休。时间偏好更强的受访者愿意舍弃当下的利益来换取未来更大的利益，他们对因时间而带来的波动性更不敏感，并且偏好通过延迟退休积累更多的工资收入。

此外，我们还发现，**个人的客观金融素养同选择提前退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客观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个体的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前文分析表明，客观金融素养同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呈正相关，金融素养更高通常意味着个人对金融工具的使用较为熟悉，既往研究也揭示了他们在平时能够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退休准备，因而更倾向于选择灵活、弹性的退休政策。收入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提前退休，但在控制客观金融素养后效应不显著。高收入个体通常拥有更多的财务储备和财务工具，对于长寿风险、健康风险有更强的应对能力，且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在面对生育问题、赡养问题时有更多的处理余地，故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有限。

6.3 中国居民对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导致许多国家难以维持公共养老金的平衡。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于 1994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三支柱”养老金改革模式的建议。具体而言，“三支柱”的第一支柱是政府或法律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在我国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一般采用现收现付制。截止 2022 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5.03 亿人，基金收入达 6.33 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49 亿人，收入 5609 亿元。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者都是与职业关联、单位职工参与、市场运营、政府监督性质的补充养老制度，且在政府推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中国的企业年金于本世纪初期开始实施，职业年金制度自 2014 年起开始实行，但限于事业单位职工。2022 年末，我国共有 12.80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覆盖职工 3010 万人，基金规模达到 2.87 万亿元，自 2007 年以来的收益率为年均 6.58%。第三支柱是通过个人金融手段增加保障的商业养老保险，或其他以养老为目的的个人投资。在我国表现为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探索早，起步晚。2022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个人养老金对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业）年金的补充功能，健全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制度方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并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意见还规定，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自主选择购买不同类型的合规金融产品，包括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公募基金等。2022 年 10 月，人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养老金政策正式落地。2022 年 11 月，北京、天津等 36 地作为先行地市开启试点工作，至 2022 年末，已有约 2000 万人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2023 年 9 月，金融监管总局开启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工作，预计在年底完成，有望进一步推动个人养老金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生育意愿下降，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收支平衡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新的“第三支柱”分摊养老负担。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提前进行退休准备，是保证公民未来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公民对自身负责任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居民退休准备决策的影响，本次调研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及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支持态度、预期支取模式，以及现行的 12000 元缴费上限的支持程度。

6.3.1 居民缺乏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对政策普遍持观望态度

我们首先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了解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及是否支持这一制度。鉴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从实施至调查结束时尚未满一年，以及仅在部分城市开展了试点，我们预期居民对该制度的了解程度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缺乏认识。如图 6.6，仅 21.21% 的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比较了解或完全了解，42.91% 的受访者一般了解，有 10.76% 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此前的预期。

在支持程度上，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总体持观望态度，如图 6.7，51.15% 的受访者对该制度的设立保持中立，34.03% 的受访者持明确支持态度（即选择“比较支持”和“完全支持”），仅不到 15% 的受访者明确反对新制度。从受访者对制度的了解程度来看，在明确了解的受访者



（“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中，有 60.33% 的人对该制度持明确支持态度，该比例远高于 34.03% 的平均支持率。在“一般了解”该制度的受访者中，有 54.67% 的人选择了“一般支持”，与平均水平相近；另有 33.56% 的人持明确支持态度，显示出居民有意愿进一步了解个人养老金制度，并整体上持开放态度。在明确不了解（“完全不了解”和“比较不了解”）的受访者中，有 22.14% 的人明确反对该项制度。以上结果表明，**越了解制度内容的人越倾向于支持该制度**，因此，我们预计，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的进一步展开，公众对其的支持态度将进一步提升，这从侧面显示了普及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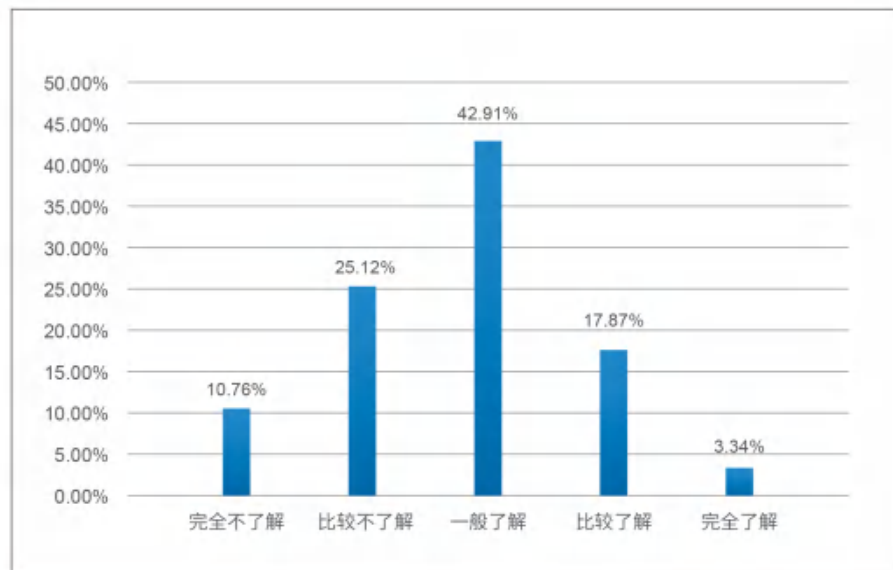


图6.6 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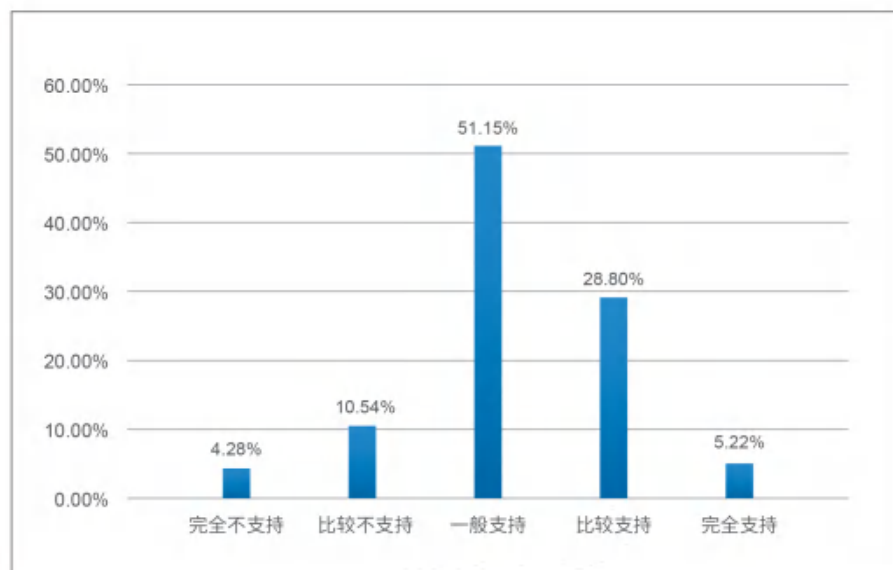


图6.7 受访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

在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践方面，截止 2023 年 9 月，仅有 6.85% 的受访者建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在 2023 年 1 月前建立账户的人数占比约为 1.39%，与同期公开数据显示的全国平均比例 1.67% 相近。从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每月新开账户的人数较为平稳；但在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有小幅上涨，考虑到春节影响后，可能反应了政策落地后短时间内，居民开设个人养老账户存在短暂热度。从金额方面看，开设账户的受访者的月存款金额的中位数为 500 元，均值为 483 元，总体分布呈现偏向两端的特点，即 200 元以内和 900 元以上人数占比较大，选择投入中间区段数额的受访者占比较小。按照现行年缴费限额 12000 元换算，平均月缴费额最大为 1000 元，因此，实际数据体现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持有者的保守和观望心态。

6.3.2 现行缴费上限具有一定吸引力，仍存在预期提升空间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 12000 元，我们继续探究这一规定对居民决策的约束作用。首先，我们研究了缴费上限带来的税收优惠力度是否对居民具有吸引力；其次，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不存在约束条件下合意的缴费上限。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缴费上限带来的税收优惠具有一定吸引力，其中 49.07% 的受访者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一般吸引”，26.67% 的受访者认为政策“比较吸引”或“完全吸引”。此外我们还发现，越了解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受访者感受到的吸引力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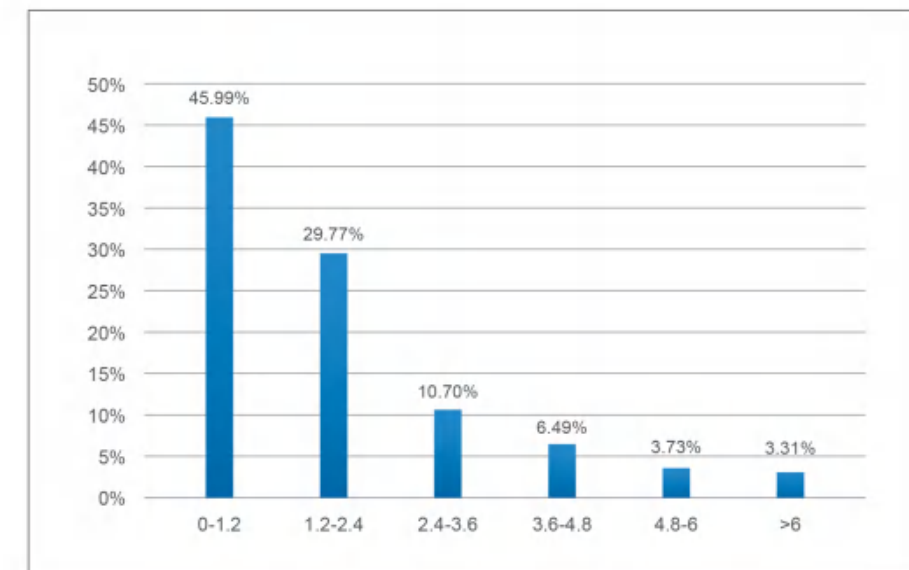


图6.8 对受访者年个人养老金账户理想缴费额（万元）的估计

接下来，我们在现有缴费上限约束不存在的条件下，询问受访者合意的缴费上限。结果显示，受访者愿意缴纳的个人养老金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的中位数约为 20%，选择 0%-20% 之间的受访者占比最大，约有 36.60% 的受访者愿意将不超过 10% 的收入存入个人养老基金；约 25.86% 的受访者愿意将 20%-40% 的收入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我们用受访者意愿缴费的比例与个人税前可支配收入的乘积，来估计个人在无约束条件下每年愿意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在排除了无意愿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即理想额度为 0）的样本后，整体结果如图 6.8 所示。我们发现，当前的缴费上限 1.2 万元基本处于理想缴费上限分布的中位水平：约 54% 的受访者的合意缴费上限高于目前的缴费上限；24.24% 的受访者每年愿意存入的金额超出目前缴费上限的 2 倍。这表明尽管当前的缴费上限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为了满足不同收入、不同风险状况的居民对养老保障的差异化需求，**当前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缴费上限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6.3.3 选择年金式领取方式人群有限，普及个人养老金政策或是有效手段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中规定：鼓励参加人长期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按月领取时，可以按照基本养老保险确定的计发月数逐月领取，也可以按照自己选定的领取月数逐月领取，领完为止。或者按照自己确定的固定额度逐月领取，领完为止。参加人选取分次领取的，应选定领取期限，明确领取次数或方式，领完为止。为了了解我国居民希望的领取养老金的方式，我们设置了五种可能的领取方案：

- (1) 一次全部提取；
- (2)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常 3-5 年），分次地将资金全部提取；
- (3) 在未来的生活中，每月定期领取固定的金额（例如年金化领取）；
- (4) 将一部分储蓄一次性领取，剩余的年金化领取；
- (5) 不适用，不打算参与个人养老金。

综合来看，尽管国家鼓励参加人长期领取个人养老金，**选择固定额度逐月领取的受访者也最多**，占比 40.96%；但仍分别有 26.50% 和 15.74% 的受访者选择“分次全部提取”或“一次全部提取”。**较大比例的受访者放弃按月长期领取个人养老金**，或是出于避税的考虑，但却让个人暴露在长寿风险之下。

我们进一步研究影响受访者选择采用定期提取的因素。方法是，通过构建关于是否选择定期提取的哑变量作为因变量，以个人收入、性别、主观风险承受能力、对个人养老金制度了解程度等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收入个体倾向于不选择定期提取**，这可能和他们生命周期个阶段上现金流较为充裕，对个人养老金需求不大，更倾向于提前确定收入有关；数据还表明，个人收入和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支持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另外，我们发现，**个人主观金融素养同选择定期提取方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主观金融素养评分较高的个体有可能出现过度自信的现象，侧面反映了这些受访者可能不了解不同领取方式之间的差异。将主观金融素养换为客观金融素养后，我们发现这一解释变量在回归中并不显著，但同选择定期提取之间有正向关系。最后，在控制了收入、年龄、性别、自评健康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主观金融素养后，**受访者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年金化的支付方式。**对制

度“一般了解”的个体在相应选择比例上比“完全不了解”的群体高出约 47%，比“比较不了解”的群体高出约 18%；但随着了解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一效应逐渐消失，说明政策信息在人群中的暴露程度对居民的理性选择有重要意义。如何让个人养老金政策普遍深入人心，使居民正确运用好“第三支柱”，任务依然艰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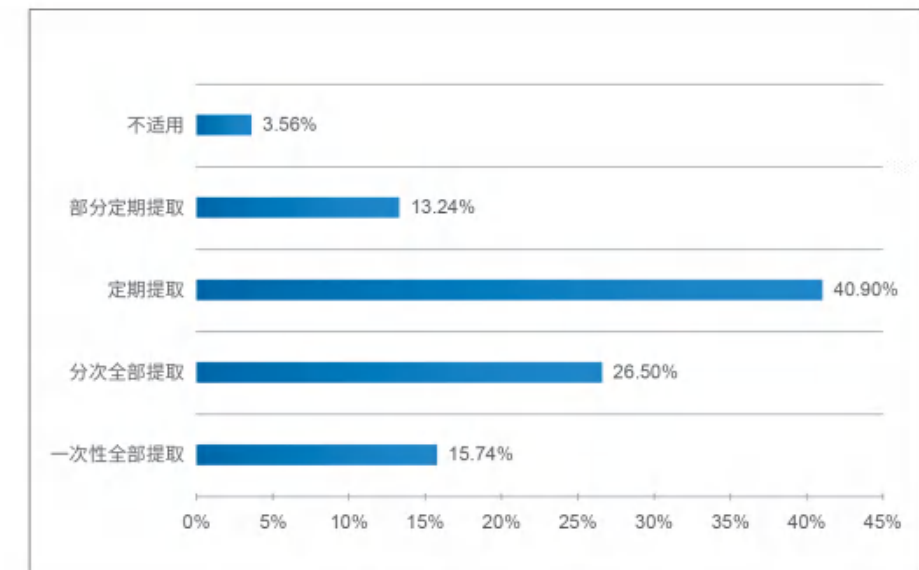


图6.9 受访者希望的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方式



6.4 青年群体的退休准备分析

本次调研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年龄在 18-35 岁的青年群体。青年群体正处于事业上升的黄金时期，大多数人是 20 世纪末期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在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一代青年将面临比现在的中老年人更为严峻的退休准备挑战。对青年群体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退休生活预期和准备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社会养老体系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通过关注这一群体，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退休期望和准备状况，从而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支持。

6.4.1 青年群体的退休生活预期

在询问青年群体对于自己未来预期退休年龄的看法时，多数受访者对预期退休年龄比较乐观。约六成的人认为自己将在 55-60 岁退休，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能够在 55 岁之前提前退休，认为自己将在 66 岁及以上退休的人只占青年受访者群体的 1.94%。绝大多数青年群体认为自己的退休年龄不会超过 65 岁，意味着他们认为，即使实施了延迟退休政策，也会有限度地实施，并且说明大多数青年群体对于退休年龄有基本的认知。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年轻人持有提前退休的信念，对于自己能够提前退休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着相对积极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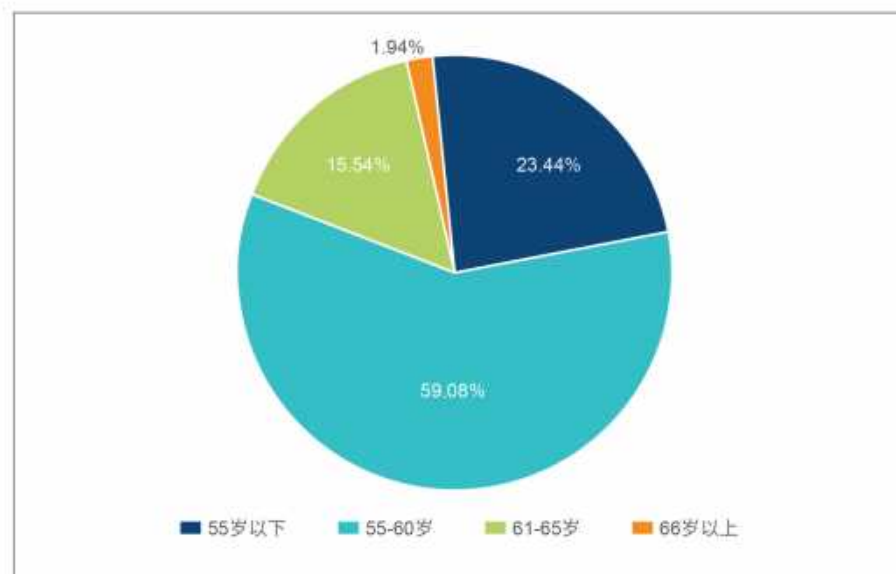


图6.10 18-35岁受访者选择的预期退休年龄

对于退休后的预期余寿，青年群体的答案差异很大。有 44.38%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退休后的预期余寿超过 20 年，这与不少年轻人拥有提前退休的观点相印证，同时还有 23.68% 的青年受访者认为自己退休后预期余寿不会超过 15 年。总体而言，与现在的中老年人相比，一定数量的青年群体会认为将有机会享受更长时间的退休后生活，还有部分人坚信自己会提前退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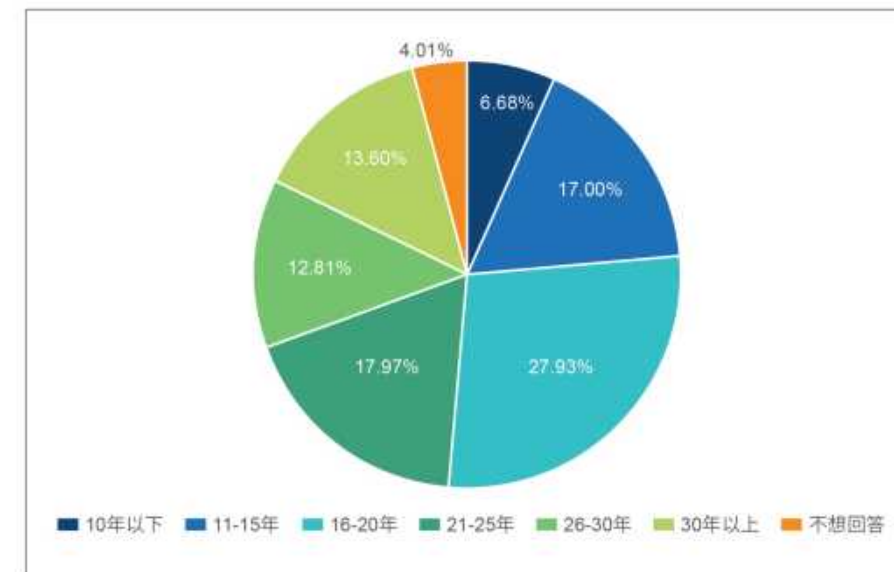


图6.11 18-35岁受访者选择的预期的退休后余寿

在养老方式方面，青年群体仍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超过八成的青年受访者选择在家居住生活，由子女进行照顾和陪伴或由政府和社区提供必要的上门或托老服务，少部分人开始关注商业养老机构提供的家庭护理服务，并且认为该项服务或许是较好的退休养老方式，只有约 12% 的青年受访者认为居住在养老院或养老中心是更好的养老方式。这说明青年群体的大多数对退休后离开家居生活仍心怀顾虑，不愿接受在养老院或养老中心度过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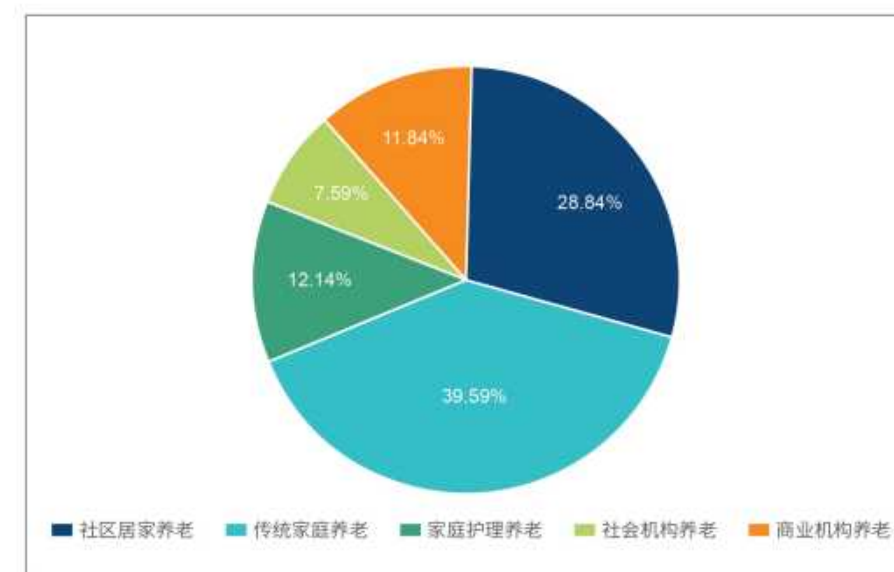


图6.12 18-35岁受访者期待的养老方式

青年群体预计退休后最为担忧的问题分别是“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和“无力支付医疗、护理费用等巨额支出”，**即青年群体最为担忧的还是身体健康问题，其次是心理健康问题。**对于个人未来的退休生活，青年群体一方面期待拥有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对退休后的健康状况又充满担忧，并且很多受访者已经认识到退休后可能面临健康状况不佳需要高额的医疗与护理服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退休后的医疗与护理支出，在风险意识逐渐提高的过程中，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年轻人寻找适合的医疗与护理保险，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开发相应的产品以满足青年群体商业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除此以外，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青年人较为担忧的问题。由于工作、养老以及育儿的压力，青年人正面对更重的心理压力，在关心身体健康状况的同时还应当格外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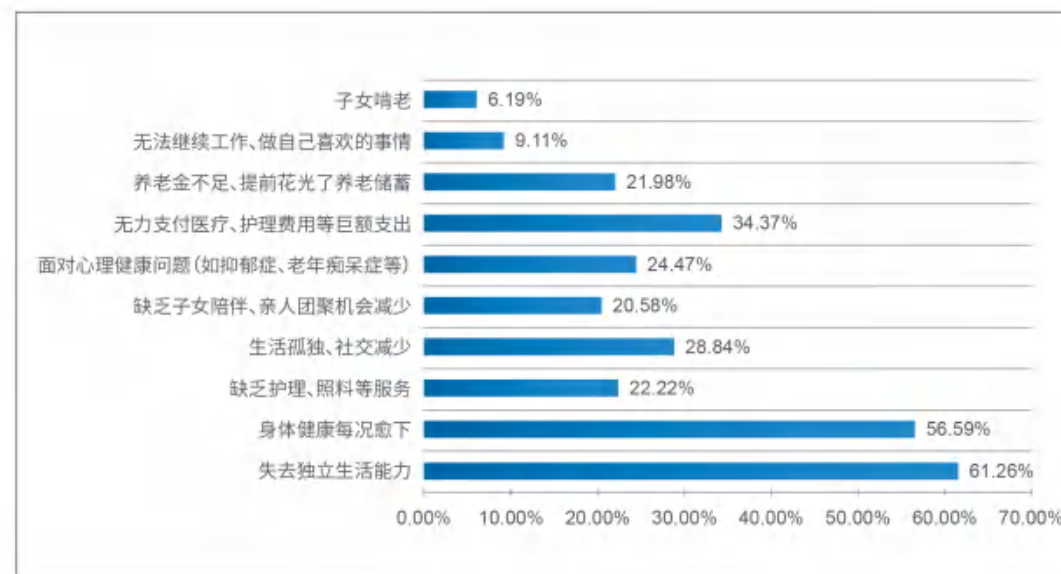


图6.13 青年群体对退休生活担忧的因素

6.4.2 青年群体的退休计划和准备情况

青年群体的退休计划和准备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首先，我们对青年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行了调查。接近四成的受访者税前年收入在 6-10 万元之间，只有 6.13% 受访者的税前年收入高于 20 万元，**反映出青年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为了更深入了解青年群体如何分配自己的收入，我们询问了受访者愿意将当前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退休养老储蓄。结果发现，36.57% 的受访者选择将小于 10% 的收入用于养老储蓄，而 44.65% 的受访者选择将 11%—30% 的收入用于养老储蓄，表明**大多数年轻人只是愿意将较小部分收入用于养老储蓄。**当他们被要求评价自己的养老储蓄水平时，有 16.76%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比较充分或充分，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比较不充分，其中将近四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很难为退休存下足够的资金。同样，当被问及退休后对取得自身期

望的退休收入有多大信心时，只有不到四成的受访者比较有信心或者完全有信心，说明**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目前的储蓄水平是不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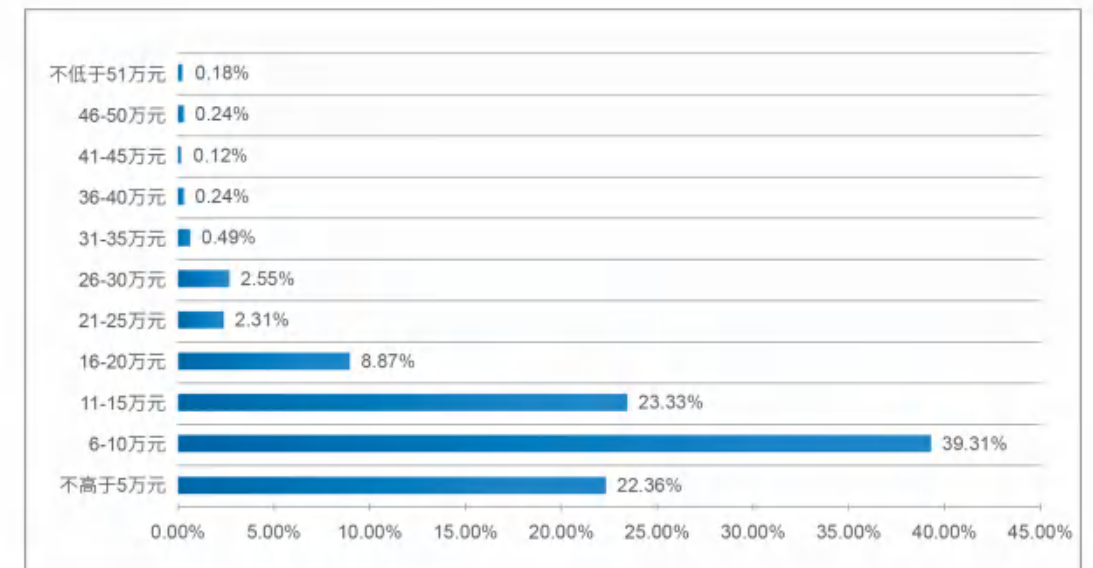


图6.14 青年群体的个人税前年收入

青年群体的养老储蓄水平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养老储蓄，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养老风险的感知能力较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将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眼前的生活。**青年人面临着许多优先事项，如家庭一般生活支出、子女教育开支等，这可能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关，当大多数青年生活在城市里时，他们面临着较高的生活成本和包括房贷等在内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难以在年轻时将较多资金用于养老储蓄。因此，社会和政府应考虑更多的措施，如对生育和子女教育的方面的经济支持，以减轻年轻人家庭的经济压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当前需求与未来准备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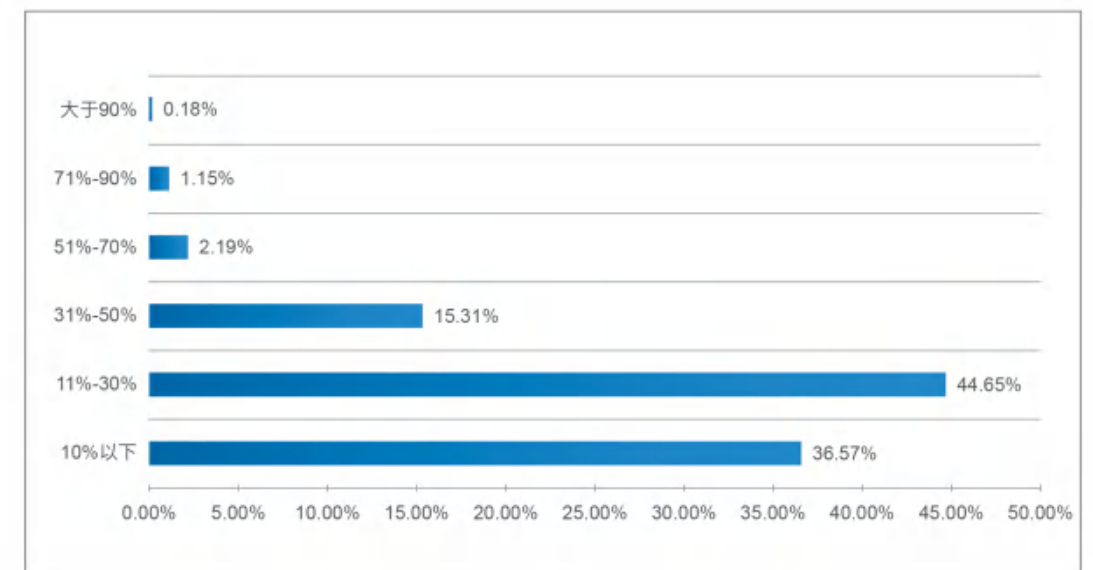


图6.15 青年群体愿意将收入中用于养老储蓄的比例

除了了解青年群体的养老储蓄水平外，我们还询问了他们对自身退休规划的评价。只有 13.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较完善或完善的退休规划，将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还完全没有退休规划，**意味着青年群体在资产配置（如房产、商业保险、退休储蓄）时较少将退休后的生活考虑在内**。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年纪轻，难以判断未来的生活水平和身体状况，包括老年时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变化等。因此青年群体可能感到难以规划退休后的生活和资产，或者忽视了退休规划的紧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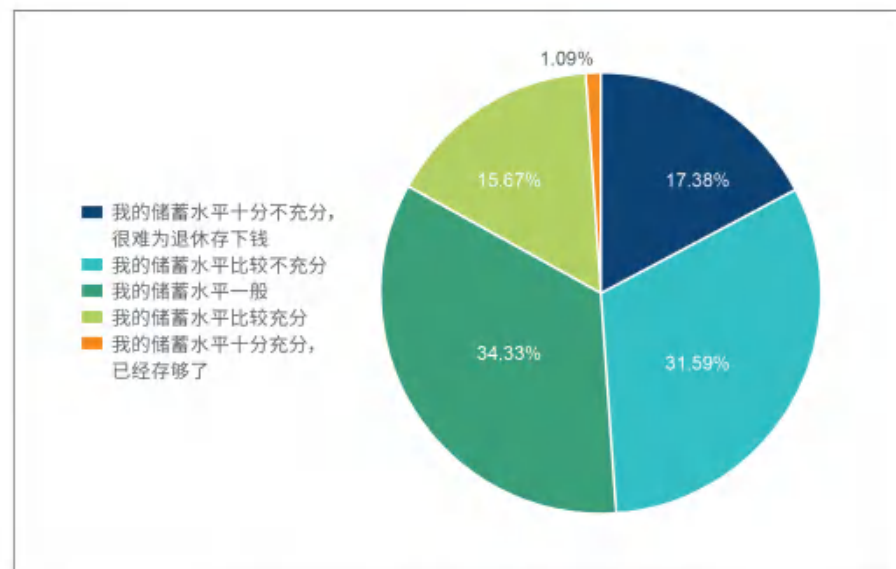


图6.16 青年群体对自身养老储蓄水平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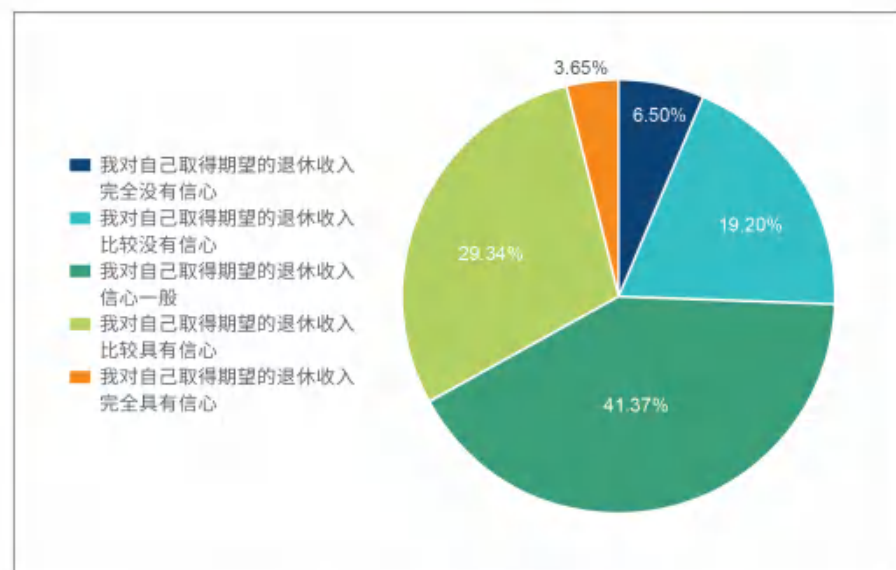


图6.17 青年群体对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的信心

总之，**尽管青年人普遍认识到养老储蓄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储蓄水平和退休规划的完善程度仍然较低**，表明一部分青年人可能未能充分利用他们的投资潜力，或者他们需要更多的金融知识和规划指导来做出财务规划和退休规划。这也说明在社会层面上提供更多的金融教育和支持的重要性，以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应对养老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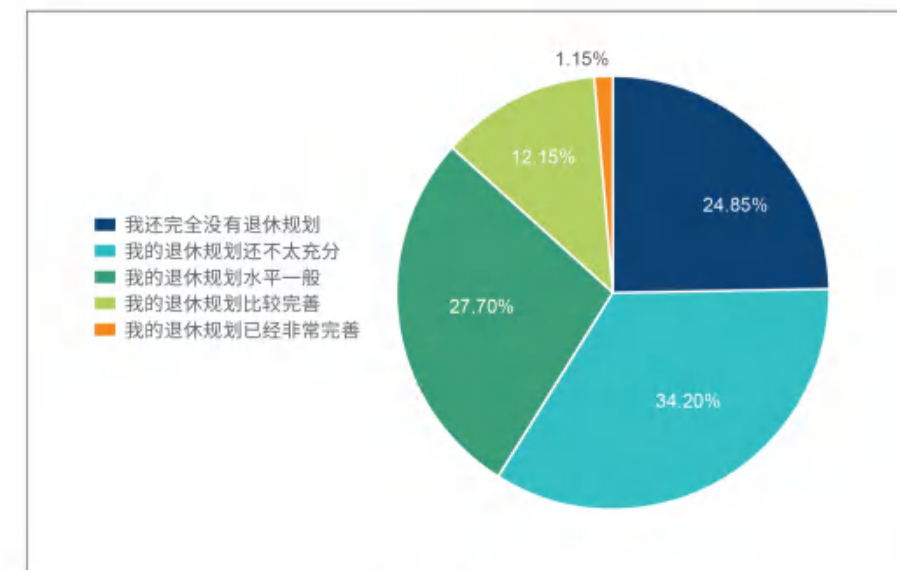


图6.18 青年群体对自身退休规划完善程度的评价

6.4.3 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看法

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已经步入较高度老龄化社会，未来数十年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与国家养老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的问题。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发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将由 2015 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转变为实施三孩政策。2021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宣告了我国三孩时代正式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为了了解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现状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自身生育决策的考量，我们询问了受访者认为的生育孩子最主要的目的和导致当下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下的原因。

青年群体对生育孩子的目的的看法较为多样。受访者认为的生育孩子最主要的三个目的分别是：“喜爱孩子，体验做父母的乐趣”、“养儿防老，在退休后能获得子女照顾”和“传宗



接代，延续血脉”。此外，还有部分受访者认为生育孩子没有特殊的目的性，是自然的人类行为，还有“维系和加强夫妻感情”和“响应国家号召，为社会做贡献”等。这说明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已经成为了部分青年生育的原因，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责任意识，同时意识到了生育对养老方面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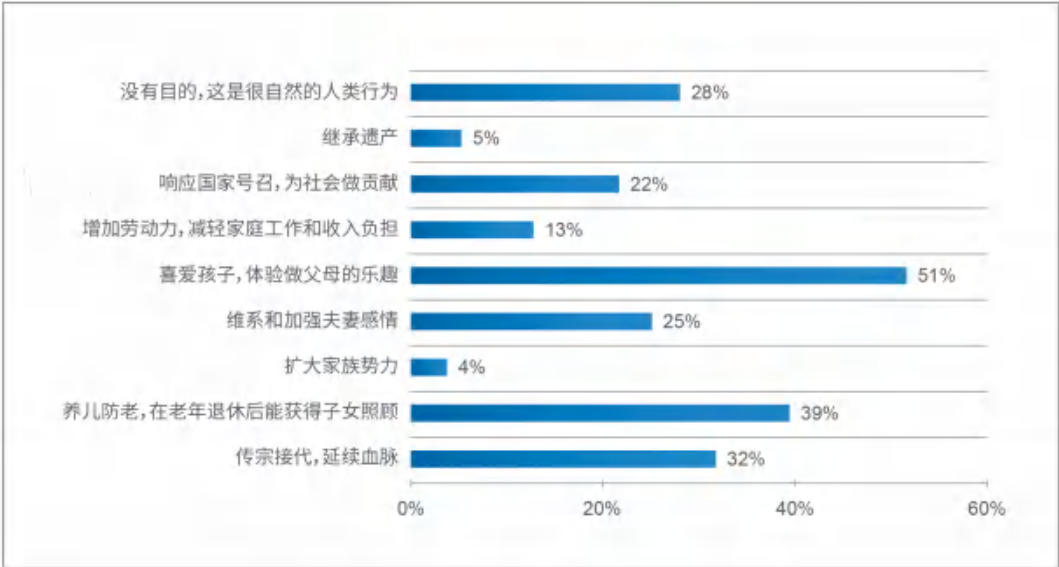


图6.19 年轻受访者认为生育孩子的主要目的

对于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受访者普遍认为主要是“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和“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太高”，选择这两个原因的受访者的占比分别高达 83% 和 77%。其次，还有部分受访者认为是“养育孩子很费力，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占比 39%。同时，“担心影响工作升迁和事业发展”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占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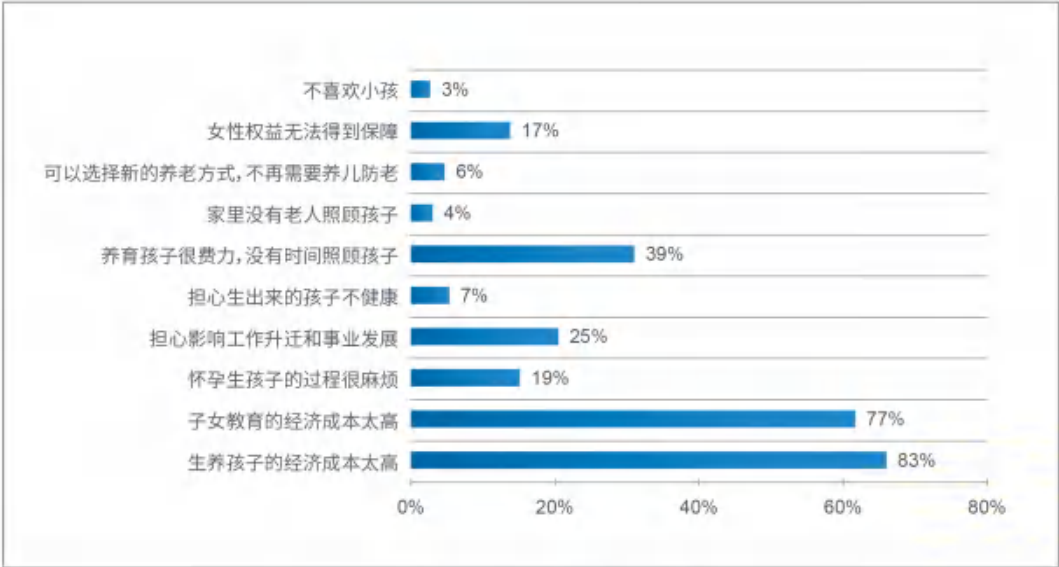


图6.20 受访者认为的社会生育意愿低下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并非“不喜欢小孩”、“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孩子”、“可以选择新的养老方式，不再需要养儿防老”，说明**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并不在小孩本身，也不是出于养老的考量，而是因为生育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家庭难以在养育小孩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因此，想要提高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应当努力降低孩子的养育成本，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在生育福利和横向公平方面的条件。

当被问及哪些因素或政策可以鼓励年轻人生育时，70% 的受访者认为是直接的经济激励措施，比如以现金形式发放生育补贴，是最有效的方式。降低子女教育成本、灵活的工作制度和间接的经济激励例如税收优惠和降低房价、增加对就业和收入的信心等也是其他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出，**青年群体认为在经济和育儿时间上的有利政策将会改善生育状况**。这与上述中国居民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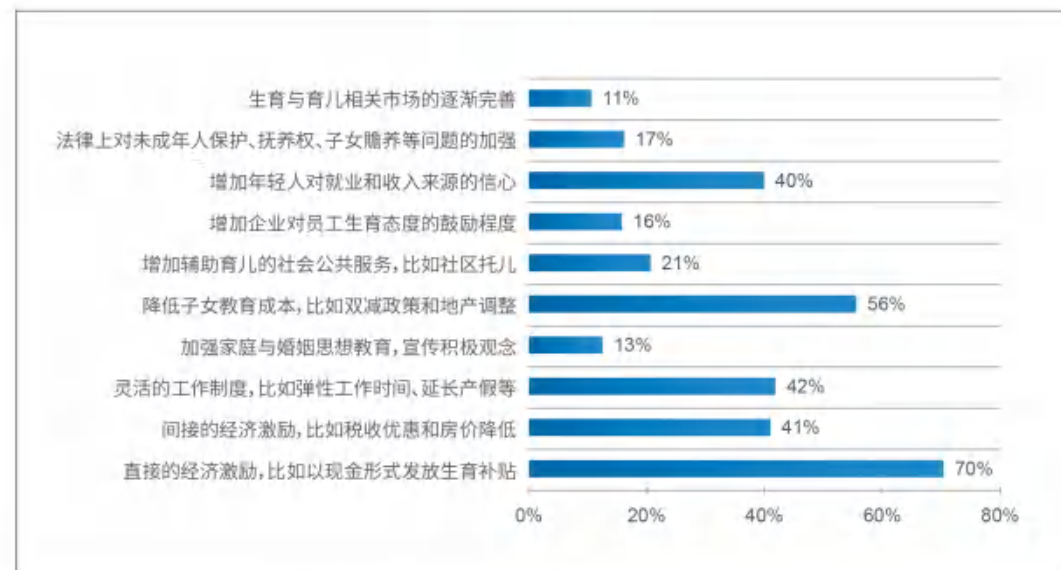


图6.21 受访者认为的能够鼓励生育的因素或政策

总体看来，**青年群体在观念上并不排斥生育子女，而是社会为年轻人创造的有利于生育的条件不足**。目前，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生育责任的重要性，从养老和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生育子女是有必要的。然而，他们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仍然集中在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包括怀孕期间的医疗费用、子女成长后的生活费用，以及为子女提供教育所需的学费等。实际上，生育子女的父母是在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因为生育不仅为国家增加劳动力，还有助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这是一种具有正面外部效应的行为。因此，从政策层面出发，应该为适龄年轻夫妇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包括提供生育补贴、子女教育补贴、子女生活费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减轻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负担。这些政策可以帮助愿意生育的夫妇克服经济上的障碍，提高社会整体生育率，维护人口稳定和社会长期发展。

6.4.4 针对青年群体的建议

基于以上对青年群体退休生活愿景和对社会生育现状看法的分析，我们对青年人在退休准备和生育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青年人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做好自己的退休规划与资产配置，有针对性地配置一些商业保险，以应对退休后的收入和健康问题。现阶段，青年人尚处在职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黄金阶段，应该及早、有意识地制定合理的工作与退休生活计划。虽然大多数青年人倾向于采用家庭养老模式，但也必须面对子女可能繁忙、无法照料以及自身健康可能不佳等问题。因此，早期的储蓄和资产规划对于资产增值和应对未来风险至关重要。

其次，青年人需要更加重视自身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应对工作与生活中各种挑战。如今的青年群体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未来将面临巨大的赡养老人与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青年群体已经更多地关注到了和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同时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医疗支出。

最后，青年人应当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养老与财政压力，提高生育责任意识，并且利用好国家和社会为适龄青年创造的良好生育条件。虽然青年人通常能够理解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但对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财政压力的认识不足。国家已经开始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愿意生育的青年人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享受国家提供的生育福利政策。他们应相信国家和社会将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同时通过相应政策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多样性，确保有孩和多孩家庭的生活质量。



07· 结论与建议

07 结论与建议

7.1 报告内容总结

本报告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退休准备指数、退休财务规划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养老准备情况，并就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感知的关系、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年轻人群的退休准备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报告使用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研究结论对养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改进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服务都有较高参考价值。

从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来看，未退休受访者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 58.01 岁，年轻人普遍预期较早退休，而学历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预期自己更晚退休，反映了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基于自己的个人情况，对退休年龄有着不同的诉求。因此灵活的退休制度或许比强制性延迟退休更符合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养老方式的选择方面，传统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更受偏好；但在年轻一代中，愿意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度过退休生活的接受度正在提高，社会机构养老和商业机构养老这两种新兴养老方式在未来有可能会慢慢变成主流选择。在退休生活品质方面，人们更重视完善的医疗制度、良好的居住和服务设施以及与家人共度时光。总体上看，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信心较高，最让居民担忧的问题普遍涉及身体健康方面，比如担忧失去独立生活能力、无法负担医疗费用和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等。除身体健康相关因素外，缺乏子女陪伴、亲人团聚机会减少也是已退休居民最担忧的问题。

报告采用和去年相同的计算方式，从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六个方面衡量测算了 2023 年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计算结果为 5.53，相比 2022 年的 5.70 有明显下降。从六个分项指标的对比可知，2023 年调查的居民样本在退休计划完善度方面明显低于 2022 年。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受访者对于未来感到不确定性增加，另外受到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个人退休计划需要重新制定。从各省的指数变化幅度看，2022 年退休准备指数较高的省份退休准备指数降幅较大，整体上看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本报告从退休收入来源、退休财务准备现状和退休财务准备需求三个角度研究了我国居民的退休财务规划情况。在目前的养老保障“三支柱”框架下，居民预期退休收入应主要来自于政府，但对来自个人养老金方面的收入比例的预期在逐渐提高，说明居民的自主养老储蓄意识在增强。在储蓄方面，居民普遍倾向于定额储蓄，但实际操作上存在一定困难，而通过养老金融产品的“强制”储蓄特性或许可以辅助居民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较为单一，房产占比超过六成，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偏低，只有较富裕的家庭才会配置风险资产和保险。受访者中商业保险的覆盖率不到 30%，而这些购买过保险产品的人中超过一半选择了寿险产品，风险保障不够多元化。另外，整体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政府和亲属的财务建议，对保险人越信任的居民购买保险的意愿越强，对保险公司 / 代理人的信任程度与商业保险覆盖率正相关。在退休财务准备需求方面，受访者在选择养老金融产品时更关注本金安全、流动性和账户操作的公开透明，对收益的要求不高。在产品之外，人们希望从金融机构获得全面、专业的养老规划咨询服务，还希望企业能提供灵活的退休制度安排。

在专题研究部分，我们首先研究了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感知，结果发现居民的金融素养相比 2022 年有所提升，且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对金融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受访者对老

龄风险客观的认知存在不足，对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等知识有待进一步学习，但对老龄风险的主观感知较强，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感知到风险。在对延迟退休的态度方面，总体而言，受访者对延迟退休态度持保留意见，持中立意见的人数最多，反对延迟退休的受访者也占有相当比例。在对待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态度方面，缺乏对个人养老金制度了解的居民对政策持观望态度，而对制度充分了解的居民则普遍支持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设立。此外，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上限在税收优惠方面具有一定吸引力，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本次调研中，我们特别关注了年龄在 18-35 岁的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青年受访者都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目前的储蓄水平是不足的。但青年群体养老储蓄水平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养老储蓄，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养老风险的感知能力较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将相当大一部分有限的收入用于维持眼前的生活质量。青年群体对于生育孩子的目的的看法较为多样。对于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青年群体普遍认为主要是“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和“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太高”。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并不在小孩本身，也不是出于养老的考量，而是因为生育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家庭难以在养育小孩的同时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调研结果说明，整体上看我国居民的退休准备尚有很大改善空间。接下来，我们针对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机构，分别给出以下建议。

7.2 政府可发挥的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政府应在缓解社会抚养压力、完善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创造良好养老生活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改善居民的退休生活预期，防止人们出现过于乐观或悲观的预期。在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上，政府应建立养老金保障机制，优化社保基金投资组合，提高居民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在延迟退休政策方面，退休时间的刚性规定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政府应适时推出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具有一定弹性的退休时点选择更受居民的欢迎。在缓解生育率下降方面，政府应当确保落实“三孩政策”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真正降低青年人的生育成本，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升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

其次，在鼓励居民个人做好退休准备方面，政府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促进“三支柱”养老金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养老金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金规模小、结构严重失衡，原因在于第二、三支柱起步晚、发展慢。因此，未来应当特别重视第二、三支柱的建设，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体承担更多的养老保障责任。在第三支柱的发展方面，政府应加强社会层面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提升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程度。此外，在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时，政府应当鼓励居民以年金化方式领取，更好发挥第二、三支柱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在应对长寿风险、实现收入保障方面的功能。

最后，在帮助个人作好退休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强社会金融素养教育，对居民的退休规划加以引导。较高的金融素养水平不仅能促进居民个体利用科学、专业的手段进行投资理财，也能提升居民的退休责任意识从而开展更充分的退休准备。在我国，居民对于来自政府的财务规划建议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因此，政府也更应当对居民的退休准备行为加以积极、正确的引导，帮助居民履行好个人的退休养老责任。

7.3 企业应做出的改善

目前，我国企业对员工提供的退休保障多集中于财务层面，最常见的方式是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保费。本次调研中，未退休居民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对于退休后财务问题的关注和退休储蓄的意识。**为了更好的满足居民财务规划的需求，企业可以通过拓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计划为员工提供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丰富员工的退休理财选择。**针对员工金融素养方面的不足，雇主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财务帮助，如组织个人理财储蓄培训，提升员工退休责任意识，聘请专业理财机构为员工提供理财建议和管理服务等。

居民在退休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痛点往往来自健康方面。居民们普遍担心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疗费用、照料看护和陪伴问题。**雇主应当提高对员工身心健康的关注程度，**可以通过组织定期体检、鼓励员工进行体育锻炼、聘请专业人士提供健康指导、健康知识普及等方式提高员工的健康水平，并在日常注意为员工提供环保、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企业不能忽视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一些工作压力大的岗位，企业应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针对我国居民普遍担心的退休后医疗费用开支，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为员工提供相关保险的方式，为员工退休后可能遇到的健康问题提供财务保障。

对于中青年员工，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其保持并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对于女性员工，企业更应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保障妇女生育和就业的权利，支持国家生育政策的推行。



针对国家可能推出的延迟退休政策，**企业和单位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鼓励员工适当延迟退休时间，帮助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鉴于我国居民没有形成延迟退休的普遍预期，在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即将落地的大背景下，雇主应承担起作为联通社会需要和居民意愿的纽带责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调和居民退休预期与社会延迟退休政策之间的差距。具体而言，**企业应该在执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为员工提供灵活的退休选项**，这也是我国居民对于企业退休支持的众多选项中呼声最高的诉求。

7.4 个人应付出的努力

居民个人应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家庭条件、个人经济与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识退休计划、退休储蓄、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以保证退休后能够有令自己满意的退休收入。对青年群体来说，他们还处在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应该及早地进行工作与生活规划，脚踏实地稳步发展，为自我提升发展不懈努力。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保持身心健康，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吝嗇于为他人提供帮助，也不羞于向他人寻求帮助。

在退休准备方面，个人应理性预期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对个人发展制定切实有效的计划，避免过于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同时，个人应注意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水平和退休准备责任意识，积极制定个人退休准备计划，养成定期储蓄的好习惯，减少不必要开支，理性地进行投资，合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同时青年群体应当关注政府退休政策的变化，以便对个人的退休计划做出积极调整。为减轻退休后对健康状况的担忧，一方面，个人应该努力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注重劳逸结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另一方面，个人还应该配置一些商业健康保险，以应对失能、大病等健康风险造成的巨额医疗支出对个人退休生活水平带来的风险。



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不断提高对财务规划问题的认识理解能力。个人应该结合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确定个人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策略选择。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过程中，应注意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适当购买一些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积极关注养老目标基金等。

在面对生育问题方面，青年群体应当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养老与财政压力，提高生育责任意识，并且利用好国家和社会为适龄青年创造的良好生育条件。社会其他群体以及不愿生育的青年群体应当积极为愿意生育的适龄青年提供良好的生育条件，认识到有孩或多孩家庭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面临的经济压力，积极促进适龄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从而保障愿意生育的青年人能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生育，享受国家创造的生育福利政策。同时青年人应该相信国家和社会必将为我们的子女创造更为优质的成长条件与环境，将能够通过相应的政策促进横向公平，保障有孩和多孩家庭的生活质量。

7.5 保险机构可作为的领域

根据智库布鲁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老年人是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2015 年，欧洲老年人共同拥有 3.7 万亿欧元的资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银发经济市场。而在中国，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对优质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作为养老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机构在帮助居民作好退休财务准备方面理应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保险公司应根据养老保障的需要，积极创新养老年金产品。

(1) 开发契合养老需求的保额可变的寿险类产品，被保险人在退休前可以获得较高身故保障，退休后则适当降低身故保障，可将保单的部分现金价值提取出来为老年生活所用。

(2) 开发可提供紧急流动性的养老年金产品，当被保险人有紧急流动性需求时，如得了大病需要医疗费用时可以获得保险给付。

(3) 积极开发与企业 / 职业年金对接的养老年金产品，当职工退休时将其在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以趸交保费的方式转为养老年金保险，使得职工退休后终身拥有稳定的收入。



(4) 开发嵌入长期护理保障的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养老年金保险合同中附加约定，如果未来被保险人进入需要护理的状态，可用当期及未来的年金给付支付护理费用。

(5) 在领取环节的设计上，应尽量鼓励被保险人长期领取。

(6) 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变额年金，体现出养老年金保险在提供长期经济收入保障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

其次，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保险公司需要从单一的“资金保障”模式向“资金保障+服务提供”模式拓展，将“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两种功能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保险+医疗服务”、“保险+健康管理”等模式，解决好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保险行业可以以保险业务为支点，以保险产品衔接上下游养老与健康服务，促进产品开发和养老业务相互融合。

最后，保险公司应当重视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积极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提升消费者对保险的正确认识。特别要注意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更频繁地利用网络，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财经媒体、短视频、公众号等自媒体正成为未来主力消费群体的选项。因此，通过互联网渠道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和退休责任意识，帮助他们正确了解金融保险产品，认识保险在退休准备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08 附录：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与计算方法

为了更贴合中国居民的生活实际，对六个维度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更清晰准确的衡量，从2022年起，我们在历年问卷题目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问卷题目如下：

- (1) （退休责任意识）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应当负责和确保退休后拥有足够的收入？

A. 我完全不需要负责
B. 我在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负责
C. 我的责任意识一般
D. 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负责
E. 我应当完全负责
- (2)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关于是否需要为退休做好财务规划，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认知水平？

A.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完全不重要
B.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不太重要
C. 我的认知水平一般
D. 我认为退休财务规划比较重要
E. 我认为财务规划非常重要
- (3)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对于退休规划中的财务问题，您认为自己的理解能力有多强？

A. 我觉得很难理解
B. 我觉得比较难理解
C. 我的理解能力一般
D. 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
E. 我觉得十分容易理解
- (4) （退休计划完善度）回想您本人的退休规划过程，就目前来说，您认为自身的退休计划有多完善？

A. 我还完全没有退休规划
B. 我的退休规划还不太充分
C. 我的退休规划水平一般
D. 我的退休规划比较完善
E. 我的退休规划已经非常完善
- (5) （退休储蓄充分度）考虑您为退休储蓄的资金，您认为自己的储蓄水平是否充分？

A.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不充分，很难为退休存下钱
B.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不充分
C. 我的储蓄水平一般
D. 我的储蓄水平比较充分
E. 我的储蓄水平十分充分，已经存够了

(6.1) 您认为自己退休后收入达到退休前收入的多大比例，能让自己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

_____ %

(6.2)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根据上一题的回答，您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有多大的信心？

- A.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没有信心
- B.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没有信心
- C.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信心一般
- D.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比较具有信心
- E. 我对自己取得期望的退休收入完全具有信心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荷兰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 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为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邀请了十二位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为六个维度要素对退休准备程度的影响的权重进行了赋值，结果如下：

表 8.1 十二位专家的赋值结果

变量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专家 6
退休责任意识	10%	10%	20%	20%	1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5%	25%	20%	15%	15%	1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10%	10%	15%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20%	20%	25%	10%	15%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5%	20%	25%	30%	20%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5%	10%	10%	5%	2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变量	专家 7	专家 8	专家 9	专家 10	专家 11	专家 12
退休责任意识	10%	30%	5%	20%	20%	2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20%	20%	20%	10%	20%	20%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20%	10%	20%	10%	10%	15%
退休计划完善度	20%	10%	10%	20%	20%	20%
退休储蓄充分度	20%	20%	40%	20%	20%	15%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	10%	5%	20%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据此我们将十二位专家的结果进行平均，得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六个维度的权重：

退休准备指数 = 退休责任意识 ×16.25%+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18.75%+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13.75%+ 退休计划完善度 ×17.50%+ 退休储蓄充分度 ×22.92%+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10.83%

表 8.2 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16.25%	18.75%	13.75%	17.50%	22.92%	10.83%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清华经管学院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同方全球人脉